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 华 书 局

1978年11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征求意见稿)

中华书局

1978年11月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人物传记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78年11月印刷 定价：0.74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内部参考，不对外。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争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丛稿》不对外展览借阅，所登文稿，不要转载和引用。

目 录

何香凝.....	尚明轩	(1)
沈钧儒.....	周天度	(9)
续范亭.....	田为本	(19)
吴禄贞.....	李宗一	(23)
司徒美堂.....	陈 民	(26)
于学忠.....	黄德昭 王 秦	(32)
张国淦.....	丁贤俊 杜春和	(36)
林 森.....	娄献阁	(39)
谭延闿.....	李静之	(43)
吴鼎昌.....	熊尚厚	(50)
盛宣怀.....	朱宗震	(54)
赵秉钧.....	李宗一	(60)
德穆楚克栋鲁普.....	卢明辉	(65)
王占元.....	张振鹤	(76)
陆费逵.....	熊尚厚	(80)
陈光甫.....	江绍贞	(84)
张伯苓.....	宗志文	(88)
胡 适.....	耿云志	(91)
张君勱.....	江绍贞	(106)
曾 朴.....	杨天石	(110)

何 香 凝

何香凝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人，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著名的女革命家。

何香凝的父亲何炳桓，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在香港药材店当店员，后为茶商，并经营地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资本家。何香凝1879年7月16日（清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香港。童年时爱好读书，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设法学习文化，尤其喜听人们讲述反清的革命故事。她从小就以太平天国的天足女战士为榜样，反对缠足，曾多次剪掉母亲强给她裹的缠足布，实行天足。这件事说明，她自幼即富有反抗封建束缚的顽强精神。

1897年10月底，何香凝与廖仲恺在香港结婚。他俩志趣相同，感情很好。1902年秋，廖仲恺为了寻找救国真理，拟赴日本留学。何香凝变卖妆奁，为之筹集费用，以成其志。同年冬，她也东渡日本，于1903年初进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06年秋，再次考进目白女子大学，攻读博物科。1908年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在高等科学习绘画，并请当时的名画家田中赖章教画动物。1910年秋，在美术学校毕业。

1903年春，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人往来密切，加上受到当时革命思潮的推动，勃发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思想。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加盟的女会员，从此积极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她的东京寓所，是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孙中山经常和党人在那里集会，商议和策划革命工作。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从收转信件、看守门户、照料茶饭到掩护同志等等。同时，还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廖仲恺等向海外华侨宣传反清革命，驳斥康、梁的反动谬论，和保皇派进行斗争。她热情横溢，不辞劳苦，踏实工作，深受孙中山以及留日革命学生的倚重和信赖，被亲切地称为“奥巴桑”（日语，意为老太婆）。

国内革命时机逐渐成熟了，在日本的同盟会员纷纷归国参加斗争。1911年2月，何香凝在“黄花岗之役”前不久回到香港。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在广东省军政府工作，何香凝随同到了广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她离开广州，亡命日本，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即努力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和护法运动。为了反袁，她在东京留日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联络活动。为了动员北洋海军参加护法，1917年她又在上海担任海军家属的发动工作。

1921年夏，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时，何香凝同宋庆龄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宋为会长，她担任总干事，带领慰劳队亲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廖仲恺于14日应陈电邀前往惠州，甫抵石龙即遭扣留，旋被囚于石井兵工厂。何香凝四出奔走，多方营救。廖仲恺于8月19日脱险后，两人设法离开广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失败以后，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毅然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何香凝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忠实执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国民党改组后，她被选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省妇运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她积极推进妇女群众运动，一面开办劳工妇女日校、夜校及贫民妇女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一面又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出版《妇女之声》旬刊，大力向妇女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民主革命，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同年秋，英帝国主义代理人陈廉伯发动商团武装暴乱，她组织人民救护队，赴广州西关区救护伤员；并筹措经费，抚恤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家属和慰问受伤的工人。

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何香凝闻讯，兼程入京侍病。孙中山病危时，她含着眼泪表示：“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①孙中山当时紧紧握着她的手，以断续的声音向她道谢。孙中山临终口授遗嘱，她是当时在场的证明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于同年5月回到广州，和廖仲恺一起为贯彻孙中山

的革命主张而努力。6月，为了镇压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阴谋叛乱，她奔走各地，筹募经费，慰问战斗中受伤的士兵。广州沙基“六·二三”惨案发生后，她领导广州妇女组织救伤团及慰问队，亲往现场救护和慰问伤员；还组织演讲团，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呼吁群起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7月，她专为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女工和工人家属，创办了“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日作工，夜学习，既保证了生活，又提高了政治思想，引导大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坚决贯彻三大革命政策的廖仲恺等极端仇恨。这年8月20日，何香凝伴同廖仲恺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反革命暴徒的狙击，廖仲恺当场遇难。何香凝目击一切，悲愤已极，“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②立志要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③

廖仲恺牺牲以后，何香凝更加坚决地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实现孙中山遗志而勤奋工作。她引用廖仲恺的话向大家宣布：“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④并明确指出：

“国内民众，十分之九，既是工农，不求工农解放，焉能有巩固之国家，安能把帝国主义之压迫根本推翻？”^⑤1925年10月，她发起组成“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大力支援农民运动；又创办“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积极进行对东征军人的救死扶伤活动，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12月，她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以期集中全国妇女力量，致力于民主革命。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续担任妇女部部长。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她号召知识妇女，“必定要与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联合起来，……同立于一条战线之上”，才能求得解放；并指出，妇女“唯一的生路”，就是努力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工作。^⑥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地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何香凝积极地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她组织慰劳队和救护队，随同北伐部队出发，先到南昌进行慰问与救伤活动；年底转赴汉口，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她同共产党人邓颖超等共同制订了妇女运动的规约，并经过共产党人和大家的努

力，把规约中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及男女都有遗产继承权等项，在汉口地区一度付诸实现。此外，她还同宋庆龄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战争的胜利前进。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恐惧不安，阴谋进行一系列的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早在北伐战争以前，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等。何香凝听到消息，立即冲过重重阻挠找到蒋介石，当面指责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⑦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何香凝严正地斥责蒋介石的叛变活动，指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⑧她和彭泽民、柳亚子等向右派分子提出强烈抗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之后，她继续提出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明确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⑨她把切实贯彻“扶助农工”政策，视为当时“刻不容缓之要图”，指出：“农工占我国人口十分之八九，其所受之压迫与痛苦独深，如农工之痛苦一日不解除，即革命一日无成功之望。”^⑩她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何香凝在上海。她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共产党，极为愤慨。既不参加邓演达组织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也坚决拒绝加入汪精卫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的“证婚人”，并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不久，她回到广州，专心创办仲恺农工学校，“思树立解放劳动群众运动之基础”^⑪；并曾在1928年亲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随后，她毅然抛弃国民党反动派加给她的一切职务，与叛徒们决裂，并于1929年离开广州出国，先赴伦敦，后到法国，居留于巴黎郊区的里拉顿岛，天天作画自娱，“亦以备将来为换米之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于同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她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斥责蒋介石专制政权的罪恶统治，提出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及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并郑重宣布：“此后坚决辞去中央委员职守”，努力尽“国民一份”应尽的责任。^⑫不久，她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将原为办理仲恺农工学校而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⑬同时，积极参加了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何香凝兴奋得热泪横流，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抗日战争。她不顾身体多病，积极向市民宣传抗战；致电海外爱国华侨呼吁援助；亲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给抗日将士发军饷；四处奔走，为十九路军征募军用品和慰问品；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伤兵医院，并经常到医院去进行慰问。

经过“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以后，何香凝更清楚地认识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丑恶面目。1935年，她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如下的一首诗，强烈地鞭挞了他的卖国行径：“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⑭

在国民党左派人士中，何香凝始终是孙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的忠诚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数千人签名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⑮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1937年2月，她在上海同宋庆龄、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⑯同年春，她热诚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了救国会的理事。这年6月，又同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并在所发表的宣言中严正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从此“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也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⑰1939年3月，在香港明确指出：只有切实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

精神，并要不折不扣做去”，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⑮此时，她常对人说自己是“民国十三年的国民党员”，表示她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而不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员。1942年在桂林的一次民主人士集会上，与会者约定每人留言纪念，她写的一句话是：“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⑯

何香凝爱国情深，抗战信心坚定不移，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制造分裂的罪恶活动。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国，就在这个民族败类发出艳电的次日，何香凝立即写文怒斥这个叛徒“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严加惩办，并指明他的所谓“防共”，“就是灭华，……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请人灭华”。她认为汪投敌后，“敌友之界线既明，抗战之信念益坚”^⑰。与此同时，她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启发下，接受了毛主席的抗日主张，不仅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决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同宋庆龄等联名通电，严厉斥责破坏团结抗战的蒋介石，呼吁全国人民警惕卖国贼的阴谋诡计，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⑱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何香凝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坚决拒绝到重庆去。1937年冬，她为了避开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从上海迁居香港；日寇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2月离港经海丰登陆，转赴韶关；同年7月，迁居桂林；1944年夏，再转移到平乐县的八步。不论流亡到何处，她总是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并为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及款项。她带着一家妇孺，靠卖画度日，到处流浪，备尝艰苦。尽管如此，她从不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任何馈赠。1942年，蒋介石派人到桂林，送去一百万元支票和请她到重庆去的信，她在信封后面写上“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批语，原封交来人退回，^⑲不予理会。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何香凝从1942年定居桂林起，就经常与李章达、柳亚子、李济琛、蔡廷锴、陈此生等人接触，要把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起来。1944年移居八步后，仍继续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问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对蒋介石坚持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更加积极地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并和陈此生等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

主促进会章程》，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11月，她从八步东下，经梧州抵广州，沿途与有关人士进一步会商，随即着手筹备建立组织的工作。1946年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正式成立。不久，为避开蒋介石的迫害，何香凝随该会中央机构迁至香港。这时，何香凝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她说：“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②③}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主促进会的组织。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场所。1947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何香凝在大会开幕的讲演中，宣布奋斗的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必须恢复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并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②④}。1948年1月，她终于和其他反蒋的国民党员及组织联合一致，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她由香港到达北平。6月，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何香凝能作旧体诗，擅长国画，尤工画虎和松、梅。她写诗作画，署名“双清楼主”^{②⑤}。遇有机会就借诗画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无情鞭挞。她的诗词和绘画作品，有相当多的数量反映着历史的重大事件。她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她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全国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职。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因病在北京逝世。遗体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侧，与廖仲恺合墓。

（尚明轩）

注：

①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页。

②同上书，第59页。

③《廖夫人香凝女士在粤军追悼廖陈二公大会演说词》，《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三民出版部1927年版，第29页。

④⑤《廖夫人何香凝女士演说》。《省港罢工工人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记》（1925年8月27日），《工人之路特号》，第六十五期。

⑥何香凝：《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的生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编《妇女之声汇刊》，1926年版，第20页。

⑦陈此生：《我对何香凝的回忆》，稿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⑧参见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香港朝阳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

⑨《廖夫人训话》，黄埔同学会1926年8月印《黄埔潮周刊》，第三期。

⑩《何香凝提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文华印务局1928年版，第160页。

⑪《何香凝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⑫何香凝：《对时局之意见》（1931年12月19日），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⑬同⑪。

⑭《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1935年），《何香凝诗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⑮《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261页。

⑯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页。

⑰《救国人狱运动宣言》，《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页。

⑱何香凝：《“三八”我要说的话》，香港《大公报》，1939年3月8日。

⑲李任仁：《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广西日报》，1962年11月8日。

⑳何香凝：《斥汪兆铭》，香港《星岛日报》元旦增刊，1939年1月1日。

㉑《为“皖南事变”电斥蒋介石》，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㉒同⑲。

②③据本文笔者访问陈此生的记录。

②④参见《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纪录》、《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纪录（一）》，原件，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②⑤当年廖何婚后，无力自立，寄居廖的兄嫂家中，但他们不给房间，只好在屋顶晒台上面搭一小屋居住。因在屋顶赏月最为适宜，故名其小屋为“双清楼”。“双清楼”，乃人月双清之意。廖牺牲后出版之《双清词草》，也具有同样含义。

沈 钧 儒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七岁从师读书，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阅读了一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科学思想的书刊，开始留心时务，并接受了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00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03年赴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了进士。

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办“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被派往日本留学。1905年9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在留日期间，他的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的，并参加了君主立宪派的活动。1907年沈钧儒学成回国，从事立宪运动，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并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在此期间，他曾延聘鲁迅等进步人士为教员。后来，他从实践中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开始转向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光复会在杭州发动新军起义，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他任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而告失败，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沈钧儒起初在浙江任教育司长，从事教育工作，又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候补

议员（后递补为参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表示反对。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沈钧儒的挚友张耀曾出任段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他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政学系的活动。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到了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系的《中华新报》主笔。次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吴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他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推动自治运动。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支持北伐战争，反对盘据浙江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①。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沈钧儒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3年，沈钧儒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沦亡。1935年，日本进一步向华北进攻，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北平学生开展了“一二九”运动。沈钧儒目睹敌寇深入，国土沦丧，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内心悲痛。他这时为忧时而写的一些诗篇，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漓其难禁。”^②在一篇四首

五言体诗中，由于爱国情深，他打破格律，一连用了五个“我是中国人”③。

“九一八”以后的严酷现实，使他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无济于事，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和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④。1936年1月28日，他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职业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31日，沈钧儒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地方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和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⑤。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向党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会有许多革命知识份子参加，共产党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有重要贡献。沈钧儒在救亡运动中，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进行了巨大而细致的组织工作，勇敢地承担起困难的任务。他虽然已是年过六十岁的老人，仍然象年青人一样热血沸腾。救国会成立后组织的上海市几次大规模群众抗日示威游行，他都是作为先导，走在队伍最前面，同游行群众一道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遇到国民党军警马队的阻挠破坏而毫不畏惧退缩。由于沈钧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加上他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等个人品德上的长处，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公

认的救国会领袖。

沈钧儒对鲁迅十分钦佩。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和宋庆龄等参加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举行葬礼，他在素轴上亲笔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并在鲁迅墓前发表了演说。

同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进行反日斗争，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组织罢工委员会，积极予以支持。

救国会的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从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和打击。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七人。12月4日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成为当时有名的“七君子”之狱。

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同志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⑥，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七人提起公诉。沈钧儒等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⑦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5月，国民党由叶楚傖出面，通过杜月笙等，向他们进行劝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反省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在戒备森严中，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⑧”。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判”，沈钧儒、邹韬奋等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了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法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斗争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沈钧儒等人的爱国入狱受审，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即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⑨，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释放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制订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并由宋庆龄率领，亲往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⑩。由于沈钧儒等七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同时“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南京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沈钧儒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抗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1937年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提出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转变为全百的全民族的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作为它的基本任务。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全民抗战》从形式和内容都作了较大的改进，销数很快达到三十万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团，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0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抗战开始后，沈钧儒与救国会，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易于接受党的领导，因此有人攻击他和救国会共产党的“尾巴”。对此，沈钧儒坚定地表示，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正确，作这样的“尾巴”，也是光荣的^⑪。在抗战期间，他还介绍和资助了不少青年前往解放区。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并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点权利，均被取消。沈钧儒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

障民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小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并曾往桂林推动宪政运动。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下旬，他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⑫。他认定抗日、民主、团结三者不可分，“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⑬。以后，他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和恫吓，何应钦造谣诬蔑他和邹韬奋、沙千里阴谋暴动，派特务加以监视，但他毫不畏惧，仍然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各地生活书店被封闭，邹韬奋被迫出亡香港，沈钧儒则仍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中旬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怕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同时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和救国会的加入，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进步，起着推动作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发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春，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被推为主席。同年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暴徒屠杀昆明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教师学生，制造了“一二·一”流血惨案。他写了一首诗：“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诤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

权”^⑭，愤怒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随后，他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该刊发刊词指出：“抗战胜利了，但人民没有得到胜利果实”，现实“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表示要站在人民方面，“用笔和舌来号召团结，争取民主”。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沈钧儒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同年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他和民盟其他负责人发表声明反对伪“国大”的召开，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随后，沈钧儒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职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他谴责美蒋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同时反对民盟内部的妥协倾向。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初，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被国民党的强迫撤退回延安，民盟负责人之一黄炎培因畏惧动摇起草了一个宣言，提出内战责任国共双方共同分担的错误主张，混淆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的界限，声称：“须知不论谁胜谁败，所屠杀者都是中国之人民，所斲丧者都是中国之元气。”^⑮沈钧儒认为宣言内容不分是非曲直，“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⑯，极力反对发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另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随着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分歧也加大，妥协性增长。同年10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政治压力面前，黄炎培、罗隆基动摇屈服，在与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谈判后，同意宣布自即日起民盟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反对向国民党妥协投降，^⑰表示民盟一定要继续搞下去。随后，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以便恢复民盟总部的活动，并筹备召开三中全会。

沈钧儒到香港后，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汇集在香港及从内地来港的中委，在他主持下，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

中全会。当日发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措施，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发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⑮三中全会严肃地批判了盟内右翼分子政治上的投降行为，检讨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经过沈钧儒等左派同右派的激烈斗争，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一、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和民主，必须“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一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二、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只有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才有保障。”三、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指出为了彻底推翻南京反动集团及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就必须“彻底铲除这一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四、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⑯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以中常委负责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走向一边倒。民盟这一历史性转变，受到人民的欢迎。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主席，响应中共提出的筹开新的人民政协的号召。6月中旬，民盟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并为此发表声明，指出：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与全民为敌的南京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去代替它。^⑰9月，沈钧儒与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沈钧儒到解放区后，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定地跟共产党走。1949年元旦，毛主席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提出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主张。1月22日，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号召，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大会，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②1}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初，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十四年来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作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发表宣言，宣告结束。12月20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时期。沈钧儒能跟随时代的前进而继续不断地进步。他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和1958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沈钧儒为了跟上时代的步

伐，十分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经常勉励自己和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1963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招待七十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中说：“沈钧儒老人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②②”周总理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使沈钧儒非常激动，他即席讲话表示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九岁。

(周天度)

注：

-
- ①沈钧儒：《联省自治谈》，《浙江月报》第1卷，第二期。
 - ②沈钧儒《寥寥集》，1946年艺术书店出版，第25—26页。
 - ③同②第29页。
 - ④《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
 - ⑤《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
 - ⑥《“七君子”事件》1937年8月时代文艺社初版，第15页。
 - ⑦同⑥第27页。
 - ⑧同⑥第65、66页。
 - ⑨《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 ⑩《救国无罪》第127—148页。
 - ⑪范长江：《忆衡老二三事》，1963年6月15日《光明日报》。
 - ⑫1939年11月23日黄炎培日记。
 - ⑬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 ⑭同②第114页。
 - ⑮1947年3月9日《文汇报》。
 - ⑯1947年3月9日黄炎培日记。
 - ⑰1947年11月5日黄炎培日记。
 - ⑱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印：《民盟文献》第三辑，第1页。
 - ⑲以上引文均见《民盟文献》第三辑，第3—27页。
 - ⑳同⑱第51—55页。
 - ㉑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
 - ㉒《沈钧儒年谱》。

续 范 亭

续范亭，原名培梅，1893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一个中农家庭。1910年春入山西陆军小学堂，随即在族兄续西峰的引导下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山西响应革命，组成军政府，11月初决定由续西峰组织忻（州）代（州）宁（武）公团，计划攻取大同，瞰制北京。续范亭任公团总部卫队队长，奉续西峰密令，率领一支仅由二十人组成的远征队，从繁峙飞兵奇袭，终在城内同盟会会员策应下夺取了大同。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窃取了山西胜利果实，1912年将忻代宁公团强行解散，并对续范亭加以排斥和迫害。1914年续范亭因参加倒袁（世凯）反阎（锡山）斗争，复遭通缉，乃离晋去陕西省华阴县，在位于西岳华山之下的杨家花园，与陕西胡景翼、山西续西峰、河北孙岳、甘肃邓宝珊等，策划讨袁，时人称为“华下革命”或“华山聚义”。^①袁世凯称帝后，续范亭和“华山聚义”成员组织了几百人的护国队伍，从陕西夜渡黄河攻袭山西，至虞乡突遭晋军夜袭，兵败队伍失散，续范亭只身进入中条山，历尽艰险。1918年陕西靖国军兴起，“华山聚义”主要人物胡景翼在三原举义，续范亭又随胡与北洋军阀部队相持了数年。

1921年，胡景翼部为保存实力，有条件地接受北洋政府改编并进驻京汉线后，续范亭即离陕到京津及察、绥、冀、鲁各地，联络反北洋军阀的地方武装，准备待机再起。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各部组成国民军，续范亭出任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次年任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兼任国民军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并奉续西峰之命，与人共同创办北京《国民新报》，宣传孙中山晚年的政治主张。1927年任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29年任河北“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1932年任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参谋长，后任新编第一军中将总参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日寇之手，续范亭悲愤异常，曾专程去南京找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但蒋介石拒不纳谏。^②1935年11月初，续范亭鉴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又由兰州赴南京与原靖国军老友于右任共向国民党中央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但结果仍是“毫无补益”。^③他去中山陵谒陵后曾写《哭陵》一诗，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悲愤，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作了尖锐的谴责：“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醜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④他忧国忧时，痛不欲生，冀以一死造成抗日救国舆论，于12月26日下午5时在中山陵祭堂前用短剑剖腹自杀。因剑不利，得不死，旋被汽车司机和同来友人寻获遇救。他在自杀前，曾写下五首绝命诗，其中有两句是：“窃恐民意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⑤；绝命书中也表示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⑥他的这一行动，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此后，续范亭继续努力摸索抗日救国的道路。他在杭州西湖休养时，读了一些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对于如何抗日救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本质也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蒋介石曾派人送钱给他，表示“慰问”，他也凛然拒绝了。他在健康有所复原后，就于1936年11月前往大西北奔走抗日。

12月，续范亭在西安，正好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伟大感召下，他对共产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1937年初，他作为杨虎城将军的代表，回到阔别多年的山西。一抵太原，他就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他在山西威望很高，多年通缉他而不可得的阎锡山，也不得不任命他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谋。9月，他亲往平型关前线视察，曾当面指责阎锡山的亲信郭宗汾避战观战；归来后又在—一个追悼大会上予以揭露。

续范亭从平型关回到太原前，山西各阶层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已经成立，公推他为主任委员。他尽管病体羸弱，仍以炽烈的热情策划发展动委会组织，建立动委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动委会武装在敌后的蓬勃发展，大出阎锡山

意料之外，他竟然下令：动委会只准在岢岚、五寨、神池、河曲、保德五县活动，并不得发展抗日武装；已有的十个支队改编为三个支队，成立第二区保安司令部。续范亭在共产党的指示下，为了顾全抗日大局，率部赴岢岚就任第二区保安司令。

1939年初，阎锡山召集秋林（在陕西省宜川县）会议，大肆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⑦的谬论。续范亭在会上朗读孙中山遗嘱，义正辞严地批驳阎锡山及其同伙的反共谰言和投降主义论调。阎锡山曾对其核心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⑧当年秋，阎锡山企图假手日寇除掉续范亭，电令他攻打五寨县城。这时续范亭身边仅有一营兵力，而五寨县城内却盘据着大批日伪军，但他以寡敌众，用两个连迅即全歼从五寨县城出动的日寇。阎锡山见毒计落空，11月又悍然下令解散动委会，取消第二区保安司令部，原辖各支队改为陆军暂编第一师，续范亭改任师长。这样，就使续范亭失去了五县防区和部队的供应基地。但他说：

“只要我续范亭不死，我还是要抗战到底！”^⑨

同年12月，阎锡山令其骑兵司令赵承绶召集谋划反共的临县军事会议。赵是续范亭三十多年老友，认为续范亭不会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因而让他参加了这次十分机密的会议。会上赵承绶传达了阎锡山的命令：在“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拖死八路军”的基础上，进一步消灭彭八旅（八路军一二〇师彭绍辉部三五八旅），消灭地方抗日武装，控制晋西北，把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续范亭听后，借口外出，策马奔向岚县史家庄彭八旅旅部，立刻将秘密会议情况作了详尽报告。彭八旅旅部当时仅有一个团，其中又有两个营分驻各村，不足以应付阎锡山的进攻。续范亭当即决定把自己的暂一师开上去，帮助彭八旅进行战斗。暂一师、彭八旅和决死四纵队，先后开进方山、岚县交界处的战略要地赤尖岭，并召开军事会议，成立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与此同时，八路军陈（士矩）林（枫）支队和决死二纵队也从晋西南向赤尖岭靠拢。从1940年元旦开始，在续范亭指挥下，新军英勇作战，终于在1月14日攻克临县。陈林支队和决死二纵队也乘势突围来会师，取得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大胜利。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统辖决死二、四纵

队和暂一师、工卫旅^⑩，仍由续范亭任总指挥。不久一二〇师主力部队自冀中返回，和新军互相配合，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2月，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成立，续范亭被推选为行署主任，并兼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1941年5月，续范亭因戎马辛劳，痼疾日趋严重，从晋西北到延安休养。他在延安参加了1942年的整风运动，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还参加了延安的怀安诗社，经常与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及革命老同志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互相唱和，写下了许多战斗诗篇。（他1921年至1936年的诗集名为《湖山集》、1941年至1947年的诗集名为《延水集》和《南泥杂咏》。^⑪）

1942年和1945年，晋绥边区参议会继续推选续范亭为行署主任，1945年他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时他因疾病缠身不能重返前线，但每当重大时刻，虽伏枕咯血，犹振笔疾书，草拟战斗檄文。1944年8月，他在病床上口述了著名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阎锡山从辛亥以来的滔天罪行^⑫。1946年11月，胡宗南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续范亭从延安转移到晋绥边区的临县。1947年1月，他的病势不断恶化，但仍然倾注心血发表了《号召山西人民推翻万恶无耻军阀阎锡山》的新战斗篇章。

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因病入膏肓，在临县逝世。弥留之际，他致书党中央和毛主席，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请求“作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13日党中央复电宣布“接受续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书“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挽词对续范亭同志的逝世表示悼念。

（田为本）

注：

①《延水集》注二十，《续范亭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版；张淑琳：《续西峰先生事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

②黄既：《回忆续范亭同志》，《中国青年》1948年12月号。

③《中山图书馆落成纪念》，《续范亭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 ④南新宙：《续范亭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2月版。
- ⑤《东方杂志》三十三卷三号，1936年2月。
- ⑥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12月30日。
- ⑦《诤声》注十，《续范亭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 ⑧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8月24日。
- ⑨南新宙：《抗战初期的续范亭同志》，《红旗飘飘》第五辑。
- ⑩工卫旅，原称工人自卫队，后改为工人自卫旅。
- ⑪《续范亭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 ⑫同⑧。

吴 禄 贞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人，生于1880年2月10日（清光绪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其父吴利彬是秀才，在武昌教书，1898年病死。

1897年，吴禄贞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骑兵科，为中国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在校期间，与第二期学生良弼交谊甚厚。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学生参加革命。吴禄贞虽然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不同意反满学说。同时，他和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也保持友好关系。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改良派认为推翻西太后使光绪当权的机会到来。唐才常接受康有为的指使，组织“自立军”，起兵“勤王”。吴禄贞秘密回国参加“自立军”。“自立军”以汉口为中心，分立五军，吴禄贞和秦力山等率领大通前军，于8月仓促起事，与清军巷战数日，因寡不敌众，终于失败。吴禄贞逃到上海，不久返回日本士官学校。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他更加倾向民主革命。

1902年4月，他毕业回国，在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担任教习，暗中向学生宣传革命主张，在他鼓励之下，后来参加革命团体的青年有刘静庵、胡瑛等三十多人。1903年冬，他应黄兴邀请，同李书城、耿觐光等赴长沙，筹划在湖南发难。这时，适逢清廷在北京创设练兵处，编练新军。经良弼推荐，练兵处调他入京。

他“初不欲往，同志中谓君为当道注目，与其在外无所建树，不若投身中央，伺隙而动”。^①吴禄贞接受了劝告，于次年4月抵北京。

1904年5月，吴禄贞被派署理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即科长)，次年8月实授。在京时，他仍与湖北革命志士暗中保持联系。刘静庵被捕后，他通过良弼(军学司副使)和铁良(练兵处会办)向庆亲王奕劻说情，竭力挽救。1906年10月，他被派赴新疆伊犁考察新军。^②11月抵兰州，身穿便服谒见陕甘总督升允，“辞气之间未能谦和逊顺”，升允大怒，当即将他扣留，并诬奏他“冒充钦差”，沿途“需索供应”。铁良奉旨查办，一面派员前往兰州调查，一面致电升允释放他。年底他回到北京。次年6月，铁良查办结案，复奏他“并未冒充钦差”，但“往谒督臣升允，便服请见，亦与体制未协，此实因该员游学外洋多年，于中国礼节律例均未深加考究所致，其轻率疏忽之处自应量予薄惩，俾资儆惕”。^③并将其监督差使立即撤去。7月，他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充军事参议。

吉林省延吉厅与朝鲜接壤，以图们江为界。日本侵占朝鲜后，即觊觎延吉地方，并于1907年秋制造借口，派兵渡江，侵占延吉厅所属龙峪、光霁峪等地，强立“间岛”名目，妄图吞并。吴禄贞奉命“密往确查”，^④于9月担任延吉边务帮办，常驻延吉，“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⑤他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和文献记录，提出《延吉边务报告书》三册，证明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逐条驳斥了日本制造的“间岛”谬论。经他据理交涉，终于迫使日军退出侵占地方，因此得到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的赏识。1909年4月，他升任延吉边务督办，授以陆军协都统，仍驻延吉。

1908年底，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和少壮亲贵铁良、良弼等人，企图重用留日陆军学生，以削弱袁世凯北洋派的军权。载沣罢免了袁世凯以后，于1910年初调吴禄贞回北京，授以厢红旗蒙古副都统，派赴德、法两国阅操。吴禄贞回国后，向黄恺元(同盟会员)借了二万两银子，馈送庆亲王奕劻，谋出任一省巡抚。结果于12月23日被任命为陆军第六镇统制。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原由段祺瑞担任统制，协统李纯、周符麟及

各标统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小站旧人。他们对非北洋派的吴禄贞自然心怀不满。加上吴禄贞又过于操切，一上任就试图通过人事调换，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先任命同盟会会员、留日士官生张世膺为参谋官，又以“烟瘾甚重，行同盗贼”为理由，将周符麟撤职。因此，各级军官“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⑥不久，他又呈请任命李书城为标统，但陆军大臣荫昌不予批准。为此他写信指责荫昌“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⑦语气十分凌厉。荫昌怀恨在心，派陆军部检查官到第六镇秘密查访，企图罗织罪名，将他撤任。他“觉得第六镇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遂萌退志”。^⑧从此常住北京，与蒋方震、李书城等饮酒赋诗，“借以消胸中的积闷”。^⑨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他一方面庆幸革命终于发生，另一方面又为未能控制第六镇而担忧。10月14日，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赴湖北，镇压革命。他曾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他便前往保定，掌握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请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倚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秘密会商，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与此同时，山西也爆发革命，清廷急令第六镇第十二协开赴石家庄，进攻山西。吴禄贞又由滦州赶赴石家庄，令第十二协停战，并亲自赴娘子关，一面与山西军密商组织燕晋联军，合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以山西军已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他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下令停战，北洋军退出汉口，严惩纵兵焚烧汉口的军官。清廷大惊，疑心他是革命党，但又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以假言假语嘉奖他，并于4日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已经出山，由彰德到达湖北孝感，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身份指挥北洋军对革命军作战。他侦悉吴禄贞的密谋后，立即派在湖北军中的周符麟携带巨款至石家庄，以两万元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字惠田）刺吴。^⑩

吴禄贞平生志大气豪，错误地认为警备是怯懦的表现，得知周符麟至石家庄谋害他，仍不加戒备。11月16日深夜，他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至次日凌

晨，马步周率领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下令对吴禄贞以大将军例赐恤。1913年11月7日，遗体安葬于石家庄。有《吴绶卿先生遗诗》二卷行世。

（李宗一）

注：

① 《吴君禄贞事略》，见《时报》，1912年3月8日。

② 《铁良奏请将吴禄贞冒充钦差详细电复由》，光绪32年11月3日，故宫军务人事档。

③ 《奕劻等奏查复吴禄贞冒充钦差由》，光绪33年5月7日，故宫军务人事档。

④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1，页9。

⑤ 同④。

⑥ 《陆军部检查官吴宗煌上陆军大臣荫昌密呈》，宣统3年2月。

⑦ 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见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页450。

⑧ 同⑦。

⑨ 同⑦。

⑩ 关于刺杀吴禄贞的主谋人，另一说是良弼，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⑪ 张世膺字善飞，江西人。周维桢字干臣，湖北麻城人。两人都是留日士官生，同盟会会员。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是美洲方面的爱国华侨领袖。他从1880年出国到1949年归国，在美国生活了近七十年，“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①

司徒美堂原名羨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清同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开平县濬堤洲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他四岁丧父，由寡母抚养成

人。童年时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就到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

1880年，十二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希望，随同乡亲经香港乘轮船去美国。船票龙洋五十二元，是他母亲东凑西借得来的。他刚踏上旧金山码头，就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②此后，他在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帮厨，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月工资仅得十二美元。

1883年，司徒美堂先后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他激于义愤，加入洪门致公堂，^③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即吃饭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居异国，无可奈何。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加上从小又学得了格斗武术，所以遇上这类流氓，他就挺身而出，三拳两脚，把对手打翻在地，抛到街上。有一次，因把一美国流氓打伤致死，被捕坐牢，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捐营救，囚禁了十个月才获释出狱。从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华侨中传说开了。

1894年春，司徒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夫，随军舰到过南北美及欧洲各地，广开了眼界，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各阶层人物。1898年春，因“美西战争”爆发，司徒辞职不干，回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猪肉，走街串巷。

早在1894年冬，司徒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作用不大，经同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商议后，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总堂系统之内）。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司徒被拥为“大佬”（即洪门大哥）。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四十四年之久，一直到1938年他七十岁时才退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的努力活动，“安良大厦”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二万人之多。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曾经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到美洲进行民主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发动该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司徒家住过一阵子。这期间，司徒聆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孙中山对司徒的

组织能力也颇为赞许，并曾给予指导。

1905年，司徒美堂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继续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工作，并从人力、财力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人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十五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经司徒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了出去，才筹足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是由司徒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的。

司徒“为人慷慨豪爽，热心公益事业”。④他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记得清清楚楚。从本世纪初到五十年代，司徒除担任安良堂总理外，还几度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在美国华侨社团范围内，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他都有所过问，深为广大侨胞所拥戴。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约。致公堂和安良堂一贯同清朝驻外官员、保皇党相对立；其后则同国民党反动派相对立，用司徒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⑤如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到美国进行欺骗华侨的宣传活动，华侨在一次宴会上，就对他镇压广州公社、屠杀华侨子弟的罪行，严加责问，搞得他狼狈不堪，中途逃席。再如1943年，国民党CC分子肖吉珊赴美“募捐”骗钱，当他出席“七七”纪念大会时，就遭到致公堂的反对，开始是嘘声，继而是喊打，国民党外交官也无可奈何。而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陶行知等人赴美宣传抗日，由于得到司徒美堂的关照和保护，使蒋帮特务无法捣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力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⑥

1941年冬，司徒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回国。途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司徒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司徒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他因跛足而手执木杖，步行二百多里进入我东江游击区，然后经曲江、桂林到

达重庆。起初，蒋介石对司徒颇为重视，到访必迎，出则搀扶，送到第三道门；还叫吴铁城拉司徒参加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作诱饵。司徒断然予以拒绝，并于次年经印度飞返美国。

1945年初，司徒及致公堂其他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织“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大家认为另起炉灶建党，不如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更有群众基础。同年3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决定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这是美洲的致公党，同后来在国内成立的致公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致公党还只是一个社团性的群众组织。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钱、出力，这次海外归来，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们回国前夕，曾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豪门也正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6月21日，司徒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只寒暄应付一下。而23日，司徒到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不仅热情接待，事后又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

1946年11月，国民党伪国大开锣前夕，蒋介石正在洋洋得意之中，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只给五洲洪门伪国大代表一席和特别费美金三千元。司徒表示不接受。蒋介石、陈立夫又指使江征卿、杜月笙等进行“劝驾”。他们向司徒恐吓说：“蒋为人翻面无情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会吃亏。”司徒勃然大怒，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⑦紧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出面“调解”，他邀请司徒到南京美国大使馆吃饭，声称是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这位“半个美国人”的老华侨。宴会上，当司徒雷登大肆吹嘘所谓美国对华援助时，司徒美堂当场严正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掀起中国内战，是与中国

人民为敌，而不是什么“援助”。^⑧结果，宴会不欢而散。司徒美堂拒当伪国大代表后，洪门代表全部离沪返美，他自己也于1947年7月乘船去香港。

这时，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灭。他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因此留港期间，闭门谢客。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通电拥护。这个号召对司徒美堂也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他于8月12日在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临别赠言”，指出回国后的耳闻目见，使自己实在不能缄默无言，过去华侨出钱、出血、出头颅，完全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昌盛；今后“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⑨。这是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见。当时香港各报都作为要闻刊出。

司徒返美前夕，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连贯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经过深入交谈，司徒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即席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说：“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⑩随后，又起草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并郑重地签名盖章，嘱留港秘书俟他到达美国之日，即在报上发表。10月30日司徒抵达纽约，这篇声明也就于同日在香港各主要报纸上登载出来。“声明”中说：“美堂于1946年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热诚表示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⑪

司徒返回美国之后，在进步华侨人士的支持下，到美国西部各城市唐人街去访问演讲，报道祖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同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互相配合，对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思想，打击蒋帮在洪门中的活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回国之时，逃到美国的孔祥熙邀请他吃饭，假惺惺地“劝告”说：“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⑫司徒断然拒绝这种“劝告”，严正指出自己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归国。

1949年8月，八十一岁高龄的司徒美堂，毅然离开居留了将近七十年的美国，于9月4日到达北平。9月21日，他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⑬

从1949年9月到1955年5月，司徒美堂一直住在北京，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经常向国外华侨发表讲话，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抗美援朝，宣传党的政策，介绍侨乡的土地改革，扩大华侨的爱国大团结。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遗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 民)

注：

①廖承志：《首都各界人民公祭司徒美堂先生悼词》，《人民日报》1955年5月11日，第一版。

②、⑧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转引自《祖国与华侨》香港《文汇报》编，第45页，第94页。

③“洪门”是明末抗清人民群众的秘密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国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习称为“洪门致公堂”。

④陈汝舟：《美国华侨年鉴》，1946年1月版，第16页。

⑤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第六章附注，《光明日报》1950年12月5日第三版。

⑥同①。

⑦、⑩、⑫司徒丙鹤：《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第248页，第252页，第255页。

⑨香港《大公报》，1948年8月13日。

⑪司徒美堂：《祖国与华侨》，香港《文汇报》出版，第1页。（“八十有二”是本人习惯按虚岁说的）。

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1949年版，第218页。

于 学 忠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省蓬莱县人，1890年11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日）生于旅顺。①其父于文孚曾任毅军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同为毅军创始人宋庆部下。

于学忠幼年随父在军营中，1904年肄业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于学忠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被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提拔为镇守使公署中校副官长。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曾任职毅军，原隶于父部下，便电召于至襄阳，任为炮营营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于随赵旅参加对皖系吴光新作战，将吴部包围缴械。1921年秋，川鄂战起，熊克武、刘湘进攻湖北。赵荣华旅防守宜昌，战事失利，准备放弃。适逢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至宜昌督战，于往见吴，面陈反攻计划，吴即采纳。后激战五昼夜，击退川军。于因此被吴佩孚赏识，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1922年护法战争中，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的战争，当年底吴佩孚派赵荣华、于学忠率部由湖北施南入川援助杨森、刘湘，攻击熊克武。不久，赵荣华因抗拒军令被撤职，吴佩孚令于学忠为第十八混成旅旅长。

1924年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在山海关指挥作战，冯玉祥在前线倒戈，直军大败，吴逃至湖南岳州。当时于学忠率部驻施南。1925年10月吴佩孚再至武汉，经孙传芳、肖耀南等拥戴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整编直系各军，授于为第二十六师师长，仍驻施南。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师北伐，席卷湖南，直指武汉。10月10日攻下武昌，吴佩孚狼狈逃入河南，部下大部分溃散或依附他人。于学忠当时任长江上游副司令，驻宜昌，因不愿背吴，便率部北撤。1926年冬，于撤至老河口，接吴佩孚电令，任为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再撤至河南邓县。1927年5月，吴佩孚因众叛亲离，大势

已去，不得已逃到河南邓县于学忠军中暂住，不久去四川暂时依附杨森、刘存厚。于学忠出于随吴佩孚同进退的思想，也于1927年6月下野，返回蓬莱故里。

于学忠下野后，所部归冯玉祥统辖。不久，于部师、旅长因不满冯玉祥吞并异己部队的措施，又将队伍拖至安徽蒙城，并派人找于想办法。事为张作霖父子所闻，即邀于到北京商谈，于学忠便转入奉系，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仍统原部。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任于学忠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驻山海关。12月29日东北“易帜”（改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关内外实现形式上统一。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三派军阀结成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在中原混战。当时张学良拥兵关外，颇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多次派代表拉拢东北军出兵进关，未有结果，便阴谋分化东北军。此时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负责戒备山海关一带。蒋介石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与蒋是留日士官学校同学）两次给于来信，表示拉拢；又派参议石某带给于亲笔信一封，劝于举兵西向，并表示愿以华北地位为交换。于表示唯张学良之命是从，未允。蒋又遣何成浚用重金收买于部下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叛张。于闻讯，急告张学良，采取措施制止了这一阴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进兵关内。于学忠受命率第一军由沈阳出发，9月26日进驻北平。冯、阎联军失败后，经张学良保荐，南京政府发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

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成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坐镇北平。7月，石友三反蒋。张奉蒋命，把在关外看家的东北军大部调入关内讨石，并发表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平汉线作战之责。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拿办石友三。于率所部与王树常所率第二集团军及南路刘峙指挥的中央军，合力夹击石军。不到半月，在滹沱河畔深泽地区击败了石友三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又进一步图谋控制华北，平津时局紧张。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将于学忠的平津卫戍司令与王树常的河北省主席对调，于赴天津就任河北省主席。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临

行前将东北军大部分交于学忠指挥。日寇曾用种种手段对于学忠进行利诱和威胁，于皆未为所动。1935年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屈服于日本军阀的要求，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次郎缔结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方所提出的“觉书”第一条即为罢免于学忠，要求将于部五十一军撤出河北。②为了迁就日寇，何应钦几次亲自打电话逼于辞职，均遭于拒绝。5月31日南京政府乃命于将河北省府由天津迁往保定；6月6日又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发表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令其率部开赴西安（后驻天水），参加尾追徐海东率领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11月1日，于被任为甘肃省主席。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当选为中委。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于学忠由兰州到西安，12月11日晚参加了张学良为发动西安事变召集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虽力主慎重，但同意张采取“兵谏”的决定，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12月12日晚7时，驻兰州的于学忠部奉张学良命令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开会）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警察解除武装，并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的高级官员，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12月16日，于学忠飞返兰州，以后不断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边主持甘肃工作，一边参加西安各种会议。

西安事变后，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押。于学忠奉张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在此期间，于曾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为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在东北军内的进步力量。③蒋介石在无理判处张学良后，又派五个军进攻西安，并在1937年1月4日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1月5日，于学忠协同杨虎城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1月中旬南京政府提出改编东北军、西北军的甲、乙两案④，为此于学忠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见蒋介石，并极力要求释放张学良。在蒋扣押张学良并对西安步步进逼形势下，东北军内部发生“和”与“战”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紧急情况下，1月30日晚，于学忠、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同志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4日，于学忠与杨虎城及两军高级将领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的经过。2月8日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西安，东北军接受乙案，准备东调。蒋介石、何应钦等便以处理善后为名，加紧分化、瓦解东北军的活动。1937年4月，蒋调于部五十一军往蚌埠、淮阴、宿县，发表于为江苏省绥靖公署主任，驻淮阴。

1937年7月抗战开始，蒋介石调五十一军到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中旬于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25日退出青岛。次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济南和山东大片土地。此时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山东军队统交于学忠指挥，任于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于率部先后参加了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于军和其他东北军一样，由于蒋介石对“杂牌”部队的歧视，在战争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得不到补充，实力不断削弱。

1939年，于学忠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

1941年底，于学忠任山东省主席。1944年，卸去苏鲁战区总司令职务，任重庆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解放战争时期，于任南京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胁迫于去台湾，于藏在四川乡间未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民主人士，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和信任。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

（黄德昭、王 秦）

注：

①于学忠出生时间众说不一，本文根据黄曾元《毅军沿革谈》（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41页），并经由学忠家属核实。

②见《中外旧约章汇编》（三）第1019—1020页。

③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事变发动后，抗日先锋队改用百十师番号（原百十师在劳山战役中被红军消灭）。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后，逼于学忠将其解散。经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于将此部编入五十一军，保存了下来。这批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④甲案规定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沿线；17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乙案规定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17路军移驻甘肃。

主要参考资料：

《国闻周报》7卷第41期《时人汇志·于学忠》。

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

于学忠：《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黄曾元：《毅军沿革谈》，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周达夫：《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辽宁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张 国 淦

张国淦字乾若，一字仲嘉，号石公，湖北蒲圻人，1876年7月7日（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六日）生。其父张学诚曾在湘军某营充文书，后被保举为县主簿，长期在皖南牙厘总局及芜湖分局任职。张国淦幼年随父侨居安徽，曾游学豫、燕。1902年（光绪壬寅年）中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后因母病返芜湖，一度在赭山学校任教习，并向上海《沪报》投稿，论述东北政务、边防。1906年清政府设考察政治馆（后改名“宪政编查馆”），张的老师宝熙主持馆务，招张入馆任馆员。这时，他所写的关于辽、吉二省政务的文章，已在《沪报》刊出。论述黑龙江兴革的稿子，则改用“上书”方式径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得到程的赞赏。后由程专摺奏调，入程幕府。这是张国淦走上宦途的重要机缘。

1907年张国淦出关，在黑龙江历任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

等职。1910年经奏保以道员留该省补用。次年2月，又得东三省总督锡良保举，充交涉局总办。6月，调京，在奕劻内阁任统计局副局长。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授命袁世凯组阁。12月，南北议和，袁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命张国淦以“参议”身分，随唐赴沪，参与和议。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张得袁器重，曾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1913—1916年间，袁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张先后任政治会议副议长、国务院内务次长、参议院参政、政事堂参议、教育总长等职。这期间，张国淦不仅因同乡关系与副总统黎元洪结为好友，深受信任，成为黎的得力谋士；同时也和北洋军阀、官僚段祺瑞、徐世昌等关系密切。张周旋于袁、黎、段、徐之间，折冲解纷，左右逢源，博得各方的倚重，成了调解军阀官僚派系矛盾、对政局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张国淦倍受重用，先后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要职。当时，黎、段争权，形同水火。有人劝黎联冯（国璋）排段，张国淦力主调和。他以和事佬身分，奔走于府、院之间，劝说双方顾全“大局”，以便共同对付南方。后来，黎、段矛盾激化，黎元洪免除段的总理职务，政争陷入僵局。黎召张勋入京调停，张勋悍然拥废帝宣统复辟，黎元洪束手无策。张国淦向黎献计说：“为今之计，唯有通电南京冯副总统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一面起用段祺瑞，责其出师讨伐。”^①段起初拟不受黎的委任，张国淦又向段疏通，请他接受任命。张国淦就是这样既为黎保全了所谓“总统名节”，又为冯、段取得政权提供了合法根据。

1917年秋，冯国璋接任总统，段祺瑞恢复国务总理职务。张国淦也续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来，段妄图实行武力统一南北的政策，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借口，向日本乞求“西原借款”，借以扩充军备。段曾饬令农商部出面，以中日合办浦口铁厂为幌子，出卖主权，换取日本贷款。张国淦拒绝签字。从此，失去段的信任。

1918—1924年间，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相继任总统，内阁人事多变，官僚沉浮不定。张国淦却能始终连任要职，先后担任过平政院院长、高等文官惩

戒委员会委员长、农商总长兼署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司法总长。

1926—1927年间，直、奉军阀操纵下的所谓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时期，由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相继组阁。颜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内阁相标榜，声称“依法复职”^②，张原系司法总长，遂继任该职。杜内阁时期，张改署内务总长。顾维钧组阁，张留任。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支持下，举行北伐，终于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至此，张国淦也结束了他的官僚政治生涯。去职后，他移居天津，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从事史地调查研究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津迁沪。据他自称：“抗战期内，（湖北）伪省政府杨揆一屡以恢复武汉大学引诱鄙人回鄂主持，并以鄂中多数人士馈致多金，严词拒绝，迄不为动。”^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曾聘张任“湖北省先贤遗著编校处主任”。^④张辞谢任命，退还寄款，只表示“可以襄助”选编书籍。由于他没有阿附敌伪和国民党政府，抗战前后，处境窘困，曾以卖书、撰稿维持生活。据他1940年间致翁文灏信中说：“自顾十余年来，每日十二时，精力只销磨于故纸堆中。”^⑤

张国淦“晚岁专事著述”^⑥，著有《历代石经考》、《附汉石经碑图》（燕京大学国学图书馆印行）、《常熟瞿氏观书记》、《中国书装源流》（岭南大学学报印行）。此外，还有《中国方志考》、《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旗制辑要》、《黑龙江志略》、《湖北书征》、《湖北文征》、《湖北献征》、《潜园文集、诗集》等著述，多未刊行。

1949年上海解放后，张国淦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下，表示拥护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他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53年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曾就其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经历写过一些回忆录和专题稿件，除少数在《近代史资料》刊载外，余稿均存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张任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次年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专著《辛亥革命史料》于1958年3月刊行。1959年1月25日张国淦在北京病逝。他的遗稿《中国古方志考》于1962年在上海出版。

（丁贤俊 杜春和）

注：

- ①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稿本，原稿未编页码）。
- ②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第六页。
- ③张国淦：《致邓鹏九（翔海）书》。
- ④张国淦：与万武樵（耀煌）的往来书信。
- ⑤张国淦：《致翁咏霓（文灏）书》。
- ⑥张国淦：《谕瑞（儿）、蕴（媳）书》。

参考资料

- 张国淦：《上黑龙江程将军书》后记（稿本）。
- 罗振玉：《蒲圻张公传》（稿本）。
-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册。
- 吴铭：《北京内阁丛谈》《四十年来之北京》第二辑。
- 田源祯次郎：《最新支那官绅录》（大正七年八月版）（日文）。
- 张国淦：为其母七十寿辰所撰《征言引》。

林 森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1867年3月16日（同治六年二月十一日）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商人家庭。三岁时随父道炳移居福州，六岁开始读经。1877年入美国教会办的培元学校读书，1881年入鹤龄英华书院读书，1884年学业结束后离开福州赴台北电报局工作。

1895年台湾被日寇侵占，林返归大陆。1898年复去台湾，一度任台南法院嘉义支部通译，翌年春仍回福州。

1902年，林考入上海江海关工作。因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的影响，他与林述庆等组织了福建学生会，被选为主席，并派陈天尺回福州建立学生分会。他们还分别在上海和福州设立阅书报社，通过介绍新书报和通俗讲演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学生会同闽籍留日进步学生林文、方声洞等建立了联系，进而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主张。1905年同盟会成立，林森与学生会会员均入会，同盟会福建支部即秘密设在福州阅书报社内。后来黄花岗起义，福

建的死难烈士有不少人是学生会会员。

1909年，林由上海调九江关任职员，曾与吴铁城等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宣传革命，还着手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和联络新军的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与上海的陈子范、湖北的詹大悲已有联系，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便立即策动九江的新军标统马毓宝于10月23日独立。随后成立九江军政府，马为都督，林任民政部长，吴任总参议官。他们还积极联系海筹等海军舰队起义，并共同商定了统一江西、援鄂、援皖等决策。

同年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先后在沪、汉、宁开会，林为江西代表，先后赴上海、南京参加会议。会上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林森是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会议，被选为议长。2月上旬参院开始制定《临时约法》的工作。不久清帝退位，袁世凯假意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被迫向参院提出辞呈，荐袁自代，但要求把首都设在南京，袁必须服从《临时约法》并到南京就职。参院很快选袁继任临时大总统，4月又迎合袁的意旨决定临时政府和参院迁往北京。在迁都问题上，参院内有激烈的斗争，林赞同孙中山的意见，反对北迁，因而辞职未去北京赴会，于是年秋回福建建设立国民党支部。

袁世凯为加强独裁统治，1913年3月指使人暗杀了当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林又作为福建省选派的议员出席参议院会议，被举为参议院全院委员长。面对袁世凯的种种反动行径，7月，孙中山领导发动二次革命，少数国民党议员南下参加起义，多数人（特别是所谓法律派）仍继续委曲求全地呆在国会中，林也是呆在国会中的一个。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国会进一步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10月选袁为正式总统。而袁世凯实行专制的野心仍不满足，11月竟下令解散国民党，取缔国民党议员，随之国会也停止活动。林事先取得了出国护照，随即东渡日本。

林在日本东京拜会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4年春转赴美国旧金山，任民国维持会会长。该会是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为起兵讨袁而设立的筹饷机关。民国维持会曾派员巡游美洲各埠开展工作，林亲往古

巴进行募捐。同年冬美洲总支部改选干部，林当选为支部长。在他任职的三年期间，该总支部在阻止袁世凯借款、召开全美国民党恳亲大会，特别是筹款方面，成绩卓著，被孙誉为“领袖支部”^①。

1916年6月袁世凯因皇帝梦破灭，恚恨成疾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8月，国会复开，林森自美赶回北京与会。在国会中张继等原国民党议员曾组织“宪政商榷会”，与原进步党议员，即后来的研究系对立。研究系主张集权中央，拥护段内阁；商榷会则主张地方分权，省长民选。国民党议员中除入阁的谷钟秀、张耀曾等人外，多对段内阁持反对态度。林是商榷会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即“丙辰俱乐部”系。

1917年7月，黎元洪被迫再次解散国会，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东，揭举护法旗帜，林和其他一些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号召，聚集广州。8月，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选孙为军政府大元帅。林曾一度任大元帅府外交部长。这时，西南军阀多借护法以自重，而非常国会则为实力派桂系所操纵。1918年5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孙愤而辞职赴沪，专门从事著述。8月，护法国会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林是拥孙的少数议员之一。稍后林又当选为参议院议长。他曾以议长名义募捐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920年春，桂系军阀为了谋求同北洋军阀政府妥协，停发国会维持费，大部分议员离粤，林亦于4月去上海。在赴沪途中，他写信给海外友人，谈到广州情况，谓今武人违法，南北皆然，桂系压迫国会更毒于袁氏，表现了对桂系的极端愤懑。11月，陈炯明率粤军回粤，孙中山再至广州重整军政。1921年1月，国会复在广州开非常会议，林为议长。4月，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孙于5月5日就职，林代表国会授印并致词。10月，孙中山开始计议北伐，林曾为此致书海外筹款。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停止北伐。10月，许崇智回师入闽。11月，林森一度接任福建省长。1923年2月，陈退走惠州，孙中山返广州就大元帅职。7月，林被任命为大本营建设部长，兼治河督办。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

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却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11月谢持、邹鲁等纠集同伙，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党籍案”、“俄人包尔丁（鲍罗廷）顾问解雇案”、“中央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决议。②林森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并多次担任会议主席，又被推举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从而背叛孙中山，走上了反苏反共反革命的道路。1926年1月，西山会议派的一些成员受到广州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处分（林受到警告处分）。但他们不承认广州大会，同年3月仍继续在上海开非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林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在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林森是该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国民党新军阀斗争加剧，到11月底特委会无形解体。特委会成立前，蒋介石本已下野，1928年初重新上台，随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林任“国府”委员。同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蒋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林任副院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林被圈定为中央监察委员。6月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他是陵墓建筑的主持人和迎柩专使之一。

1931年2月下旬，胡汉民因同蒋介石发生矛盾被扣，3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林任立法院长。事前他已出国考察，院长职务由邵元冲暂代。4月，邓泽如等四监委弹劾蒋介石，林列名四监委之内（时他尚在国外）。5月，一些国民党政客与西南军阀在广州组成非常会议，同蒋分庭抗礼，由于林和粤方几个要人关系较密，粤方曾把他的名字列在里面。10月林从国外回来，这时宁粤双方正在和谈，他采取超然态度，不与闻任何一方的争议。“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粤方乘机倒蒋。12月，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林被推为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宁粤联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选林森为“国府”主席。林于1932年元旦就职。

林任主席不久，发生“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国民党政府暂迁洛阳。同年3月，蒋介石东山再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国民党政府仍迁回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又迁往重庆，林于11月入川。1943年5月因车祸受伤卧病，到8月1日死去。林森晚年作为蒋介石的傀儡和帮凶，一切服从蒋的意旨，对“主席职务垂拱而治”^③，因而当时流行“国府主席何曾主席国府”的民谚。他不止一次发表演说，鼓吹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读蒋的反动著作《中国之命运》。死时遗嘱尚有“所望同志同胞……服从总裁之命令”等语。^④正是由于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所以能保持主席位置长达十二年之久。

（娄献阁）

注：

①石映泉：《林森》，《林森纪念集》，第92页。

②佚名编《清党实录》，第51页。

③吴相湘：《林子超先生的一生》，《林森纪念集》，第12页。

④《中央日报》，1943年8月2日，第2版。

谭 延 闿

谭延闿，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生于1880年1月25日（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其父谭钟麟曾任陕西巡抚，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等职。谭延闿1892年入府学，1897年为优贡，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回到湖南。当时，清政府正举办“新政”，一些较开明的湖南官绅纷纷倡议兴办学堂，谭也积极投入。他通过这些活动，广泛地交结了湖南上层官绅和商界人物，猎取了相当的社会地位。

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诏书，预备立宪，并从1907年起开始筹备在京设立资政院，在各省省会设咨议局，作为立宪的“准备”。这时谭延闿和一些立

宪派分子，组织“湖南宪政公会”，进行立宪活动。1908年12月，湖南巡抚岑春蓂委他为筹办省咨议局的会办之一。第二年10月，省咨议局正式成立，谭任议长，成了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

湖南咨议局成立不久，便屡与督抚发生龃龉。1910年4月，谭延闿等不满湖广总督瑞澂为处理长沙米案参办湘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认为瑞澂诱过于人，有意为湘抚岑春蓂开脱罪责。谭以咨议局议长名义，电请军机处代奏，请旨复查，结果受到清廷严厉申斥。由于受到这次打击，加上咨议局有名无实，屡受督抚轻侮，他逐渐对清廷产生不满情绪。

1910年冬天，谭延闿到北京参加全国立宪派联合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结果清政府仅允缩短预备立宪期限，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谭延闿坚持1911年召开国会的原议，并滞留在北京，与川、鄂等省代表谋划组织第四次请愿。不料清廷竟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立宪派见势不妙，纷纷离京。谭也回到湖南。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昏庸贪鄙著名的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大为失望。恰在这时，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谭延闿入京参加，并任会议主席。会议决定成立“宪友会”，以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联责内阁相号召，谭延闿并被推定为湖南支部的发起人。他们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先后两次上书清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朝廷另简贤能，重新组织联责内阁，结果受到清廷严词申斥。咨议局联合会关于借债问题、禁烟问题等所上各书，也都未获结果。这时湖南、四川为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而兴起的群众运动已渐开展，全国临近革命高潮。谭延闿等预感时局将有急剧变化，遂纷纷离开北京，各回本省。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相当力量。但革命派活动是秘密的，并且主要在会党之中进行，而立宪派的活动是公开的、合法的，在社会上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且受到绅商各界的全力支持，因而他们在政治力量上拥有相当的优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也顺风转舵，投机附和革命。但是他却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所谓“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

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①与此同时，立宪派开始策划抢夺政权的活动，预定“举事后大会于咨议局，推举谭延闿为都督”。^②当新军发动起义，攻进长沙城时，立宪派就曾擅用“都督谭”名义发布告示。10月22日，长沙起义胜利，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军政府正副都督。立宪派夺取政权的目的未遂，于是便一面造作谣言，对焦达峰、陈作新等进行中伤，并挑拨绅商、新军与都督府的关系；一面借口“提倡民治”，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一个“湖南参议院”，推举谭延闿为院长，议员几乎全部都是原咨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府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根据这个规定，参议院便成了凌驾都督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接着，他们又借口“军民分治”，进一步要求设军政、民政两部，由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总揽一切政务，部下设六司，其负责人也都由立宪派担任。这样，正副都督便被架空，以谭延闿为头子的立宪派事实上控制了湖南政权。

10月26日，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来到湖南，鉴于都督大权旁落，主张取消由立宪派把持的参议院和军政部，集权力于都督府。立宪派得知这个消息，深夜秘密集会，制定了由新军第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杀害焦、陈的阴谋计划。30日，焦达峰召集各界代表在咨议局开会，通过了谭人凤等的建议，谭延闿被迫表示辞去参议院院长等职。第二天立宪派便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二都督。焦、陈牺牲后，咨议局推举谭延闿继任都督。紧接着，他们又夺取了湖南各级政权，镇压了各地的人民起义。这样，谭延闿等立宪派向清朝廷跪求多年而不可得的政治权力，现在用流血手段从革命者那里夺到自己手中。湖南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立宪派篡夺了。1912年7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批新旧官僚政客。湖南支部在9月改组时，也把谭延闿拉了进来，并且推他当支部长。这时，谭对革命党人施展了一套逢迎笼络的惯用手腕。黄兴于这一年10月回到长沙，谭组织盛大欢迎，称颂黄为“开国元勋”，还把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但是，在他控制的权力机构中，仍然以原来的立宪派为其骨干，同时又拉进一

些旧官僚、旧军官以为己用。他还派亲信秘书唐乾一常驻北京，通过政客汤化龙同黎元洪相勾结，也想同袁世凯拉上关系。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纷纷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湖南的下层国民党势力也成立了“湖南公民联合会”，要求湖南当局脱离袁世凯宣布独立，并声称，如果谭延闿敢于违背众意，将给予“相当之对待”。谭延闿立即派人秘密到武昌对黎元洪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劝以“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合，徐图救平”。③谭按照黎元洪所授机宜，便在7月25日宣布“独立”。宣布“独立”前，他故意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烧了军装局所存的军械子弹，以使革命党人在独立后赤手空拳，无所作为；宣布“独立”后，谭却按兵不动，不去援助讨袁军。不久，江西、南京方面讨袁军先后失败，谭延闿便在8月13日通电取消“独立”，并且杀害了坚决反对取消独立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他曾通电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④

湖南取消“独立”不久，黎元洪即致电袁世凯为谭延闿开脱说：“湘省虽称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督暗地维持，始终一致。”⑤袁世凯虽表面声称“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⑥，但终视谭为异己。为了平定西南敌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他必须将湖南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便在10月任命海军次长汤芑铭为湖南都督，而对谭采取判处“徒刑”，再予特赦的手段把谭赶下了台。此后，谭先后寓居青岛、上海。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从云南揭幕后，湖南人民掀起了激烈的反袁驱汤斗争。1916年5月29日，汤芑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声明和袁政府脱离关系。但是由于他罪恶昭著，湖南人民仍坚持驱汤。汤通过其兄汤化龙，请在上海客居的谭延闿出面调停。谭用“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湘军旧部、国民党军人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四人回到长沙，为汤“赞襄大计”。在此之前，程潜奉孙中山命已由日本东京回湖南，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参加讨袁驱汤。7月，程潜率军大败汤部于道林，进迫长沙。汤芑铭仓惶逃走。赵恒惕、陈复初等乘机拥谭延闿回湘。当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

任国务总理。8月4日北洋政府任命谭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程潜愤而离长沙往上海。

谭延闿二次督湘，并不符合段祺瑞政府要由北洋军阀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的意图。谭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利用黎、段矛盾，另一方面又与广西军阀陆荣廷订立湘桂攻守同盟，使段不敢轻易下手。谭更利用湖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心理，提倡“湘人治湘”，反对北军侵入。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援助，推行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统一政策，又一次废弃了《临时约法》。8月6日，下令改派陆军部次长付良佐（湖南人）为湖南督军。谭延闿鉴于形势不利，不愿做空头省长，遂于9月初辞去省长职务，离湘赴沪。行前，他任命一向反对北洋军阀、同他关系密切的刘建藩署理零陵镇守使，又调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防衡山，有计划地在湘南地区安置自己的力量，以作异日回湘的准备。

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18日，刘建藩、林修梅分别在零陵、衡州宣布湘南独立。程潜也回到湖南，被推举为湘军总司令。10月初，陆荣廷出兵援湘，组织湘桂联军北伐。11月14日，付良佐兵败，弃职逃回北京。1918年3月，段祺瑞政府大举反攻，并在3月27日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北洋军犯湘主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4月占领衡阳后，因为没有得到督军职务而不愿再战，按兵不动，湘军得以退守零陵、郴州。6月，谭延闿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由上海到零陵重任湖南督军。他利用直皖矛盾，与桂系军阀一起商定联直倒段、联吴驱张的策略。但是这时，程潜还驻在郴州，不承认谭是督军。谭又利用桂系军阀和国民党的矛盾，伙同吴佩孚、陆荣廷制造了一个诬程潜通敌的事件，逼程离开了湘南。7月，谭由零陵移驻郴州，集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等职务于一身。

1919年冬，湖南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驱张运动。1920年直皖战起，5月，吴佩孚从衡阳撤防北归。按照事先的协议，吴军一面撤防，湘军便一面接防。张敬尧于6月11日仓惶逃走，谭延闿随即顺利进入长沙。从此，湖南境内北洋各系军阀均被赶走，湖南完全落入本省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统治之下。

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军阀官僚政客，还利用湖南人民深受南北军阀混战之

害而激起的强烈自治要求，打着“湘事湘人自决”、“还政于民”的幌子，在1920年7月22日向全国发出“褫电”，宣布“湖南自治”，主张各省制定省宪，民选省长，采取联邦制统一全国。接着便开始了官办的“自治”和“制宪”活动。

驱张以后，湖南军事实力操纵在湘军总指挥赵恒惕手里，程潜也拥有相当势力。1920年11月，由于权力分配的矛盾，发生了平江兵变。程派军人以士兵闹饷为名，枪杀了谭派军官萧昌炽。这次兵变成为倒谭运动的序幕。谭为谋求与各派妥协，声言废除督军，民选省长，请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赵想利用反谭势力逼谭下台，坚不就职。11月22日，程派军官李仲麟等又通电逼谭去职，赵恒惕也不表示挽留，谭延闿只好辞职，于11月27日再一次离湘赴沪。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临时省长。

谭延闿在上海走投无路，通过湘籍国民党国会议员周震麟的介绍，于1922年投奔孙中山，加入中国国民党。陈炯明战败退出广州后，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谭延闿跟随前往，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建设部长，逐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这时，他仍不忘伺机夺回湖南地盘。6月，湘西镇守使蔡巨猷起来反赵恒惕，指责赵“甘心附北，背叛西南”。8月，谭延闿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组织“北伐讨贼湘军”，入湘讨赵，谭赵战争爆发。11月底，因陈炯明反攻广州，孙中山急电谭回师救粤，谭便率领所部湘军共五个军，由湘南入粤，谭赵之战因以结束。

陈炯明部反攻失败，广州解围后，孙中山任谭为湘军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湘军遂在广东为客军。谭有了这支一两万人的队伍作为资本，更能见重于一时。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乘江浙战争时机派兵入赣北伐，任命谭为北伐联军总司令。谭率部进入江西，被方本仁军战败，退驻北江。1925年5、6月间，谭曾参加讨伐滇桂军刘震寰、杨希闵叛乱。

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起，谭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他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他兼任军长。1926年3月汪精卫出

国，谭延闿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7月蒋介石出师北伐时，他又代理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召集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谭当选为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谭延闿这时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甚至改号为“左庵”，一面偷偷摸摸派人和蒋介石勾结，使宁汉双方对他竞相拉拢。这时，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的地主豪绅在农运高潮中受到清算斗争，许多人跑到武汉谭延闿那里造谣诽谤，攻击农民革命运动，谭的家成了地主豪绅谋划反攻倒算的大本营，谭延闿也大肆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代表官僚地主豪绅阶级向革命人民进攻。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宁汉开始合流。8月，蒋介石被桂系军阀排挤，暂时下野。9月，谭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之一，往南京与李宗仁等协商宁汉合作问题。9月15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谭被推为成立大会主席，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常委。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一度任国民政府主席，做蒋的傀儡。同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全国，10月，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五院，蒋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谭任行政院长。在1929至1930年历次新军阀混战中，蒋率师督战时，便以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总揽一切政务，充当蒋的看家犬。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脑溢血症死于南京。

（李静之）

注：

①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第7页。

②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第9页。

③《黎大总统政书》卷二十六，中华民国五年六月版，上海晋益书局印，第三页。

④《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4页。

⑤同③。

⑥子虚子：《湘事记》政党篇，第22页。

吴 鼎 昌

吴鼎昌字达铨，原籍浙江省吴兴县，1884年4月（清光绪十年三月）生于四川绥定（后名华阳县，今属成都市）。他的父亲吴赞廷在绥定府作官十余年，辞官后定居成都，置有田地房产。1896年，吴鼎昌入成都尊经书院，以后中了秀才。1901年获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预备学堂，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他在日本的时候，虽曾加入同盟会，但只是个挂名会员，从不参与同盟会的政治活动。1910年吴鼎昌回国，9月以“最优等游学毕业生”中商科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并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后经族伯吴匡涛举荐，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1911年8月，经大清银行总监督叶景葵介绍入大清银行，任总务长。辛亥革命前夕，任江西大清银行总办。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鼎昌从江西逃到上海。次年2月，上海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他任正监督。同年5月，加入共和党。11月，袁世凯政府工商部设临时工商会议，吴任副议长兼工商部顾问。1913年5月，袁世凯以梁启超出面合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为进步党，吴为进步党政务部成员。同年，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任他为造币厂监督。1914年吴经交通系头子梁士诒引见袁世凯，任为林务处督办。1915年2月，袁世凯授吴上大夫衔。12月吴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大典筹备处办事员，极力为袁世凯复辟活动卖力。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称帝，任吴为农商部次长，但未就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他又追随黎元洪，6月任中国银行总裁，10月黎元洪授他二等嘉禾章。1917年4月，周作民创办天津金城银行，吴为发起人之一，任董事。7月，河南督军、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镇芳拨盐业银行二十五万元支持张勋复辟，张勋失败后，张镇芳受到惩处，即托吴鼎昌出面维持盐业银行事务。同时，吴已与安福系发生关系，任安福俱乐部院外评议员。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乃令吴接收盐业银行，正式担任总经理。1918年3月，曹汝霖为财政总长，吴鼎昌任财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12月，吴任南北

和议北方代表，坚决反对恢复国会，参与了种种破坏和议的活动。1920年7月安福系失败后，10月吴鼎昌被直系吴佩孚列为祸首撵出政坛。此后，他只剩下盐业银行总经理一职。

1922年1月，吴鼎昌利用手中的盐业银行，联合金城、中南、大陆三行发起创立四行储蓄会，任主任。盐业等四行及其储蓄会，封建色彩浓厚，以北方数省为营业重心，主要吸收封建军阀官僚的存款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借款，投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库券，专为北洋军阀政府服务，一时居全国银行业的首领地位，因而他又成了金融集团的首脑人物。1923年，吴以资金津贴胡政之的《国闻周报》，此后常以笔名“前溪”在该刊发表文章，以图捞一个“经济学家”头衔。1926年6月，吴鼎昌出资五万元，由胡政之从王郅隆儿子的手上盘购了天津《大公报》，组织《大公报》新记公司，以胡政之为总经理，张季鸾为总编辑，自任社长。从此，他就以舆论工具《大公报》为反动统治服务，作为挤入反动集团的一份政治资本。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建立了反革命中心。吴鼎昌极端害怕革命，他一面联络各地资本家组设“全国生产协会”，妄图扼制工人的罢工斗争；一面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公开制造反革命舆论，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了《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爆发》、《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和《敬告学生》等一系列反动文章，极力推动蒋介石走上反革命道路，成为当时北方反动势力叫嚷“政治南伐”的主要角色，属黄郛、杨永泰等的同伙。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吴鼎昌大为赞赏，夸奖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拥蒋反共，而对武汉地区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则大加攻击。1928年到1930年的新军阀混战中，吴通过胡政之和张季鸾同蒋介石相勾结，以小骂大帮忙手法在《大公报》上竭力颂扬蒋介石。吴鼎昌积极拥护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1930年到1934年期间，《大公报》连篇累牍发表了《东南四省的匪祸》、《共祸果足畏耶》、《剿共与灾民》、《匪区之追击与清理》和《消灭残匪还须努力》等等反共文章。同

时，吴鼎昌还在《国闻周报》发表《如何救中国》一文，叫嚣要建立所谓“好政府”，拥护“好领袖”以“救中国”^①，支持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形势下，《大公报》曾对国民党的对日屈服妥协态度有所批评，但在上海抗战被破坏和出卖，群众抗日运动遭到镇压后，1932年4月，吴鼎昌即在上海策动成立所谓“废止内战大同盟”，号召“安内对外”，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对蒋介石“剿共”的抵抗，反对当时两广军阀的反蒋斗争，实际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在关键上为蒋介石出大力，帮大忙。7月，蒋介石在牯岭召见吴鼎昌，连续谈了一星期，对他大为赏识。11月，任他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吴鼎昌配合蒋介石的对日绥靖政策，纠集平、津、沪、汉等地的工商金融首脑，组织“赴日经济考察团”，任团长，进行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卖国勾当。同年12月，蒋介石为了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组成亲日的所谓“名流内阁”，吴鼎昌任实业部长。在其任内，他极力帮助四大家族扩展官僚资本势力，以实业部名义创设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等官僚资本企业，同时并极力接近张群、熊式辉等新政学系政客。从此，吴鼎昌由研究系和安福系旧政客一变而为国民党政学系新政客，又在国民党反动政坛上显赫起来，博取了不少官衔，如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第一组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以及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并从组织上加入了国民党。他在贵州极力加紧推行蒋介石的法西斯保甲制度和新生活运动，同时大肆搜括。先大量贱价收买鸦片，然后以严禁种烟吸烟为名，从提高鸦片烟价中大发横财。吴鼎昌还勾结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组设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和贵州企业公司。他以贵州省银行为金融机关，建立从工矿业、商业到农林业无所不包的贵州省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到1945年止，办有化工、玻璃、火柴、烟草、面粉、丝织、电气、水利、水泥、农业机械、煤矿、木业、林牧及井盐、垦植、商业等公司十六个，投资总额达法币二亿二千六百

余万元，残酷榨取贵州人民血汗。

1945年春，吴鼎昌调往重庆，任国民党政府文官长。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当上中央监察委员。同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听从政学系的献策，伪装和平，玩弄阴谋诡计，邀请毛主席去重庆举行国共谈判，由吴鼎昌起草电文，拍发延安。在蒋介石幕内，他也是一个“宠信历久不衰”、“言听计从”的政学系策士。9月，吴鼎昌兼任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蒋介石自任该局总裁）。

1946年春，蒋介石最后地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极力策动全面内战，大量在全国各地制造法西斯恐怖与反共煽惑，有组织有计划地蒙蔽各地一些学生举行反民主的反苏游行。2月22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警官学校等校的特务学生为首，举行所谓“重庆市爱国运动游行大会”。游行队伍中的特务和反动学生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然后到蒋介石的“官邸”请愿，吴鼎昌以文官长身份代蒋接见，“与各校院领队师生握手，并致慰问之忱”，竭力加以鼓励和支持^②。6月23日，上海各界十万群众举行反内战爱国大游行，并欢送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毒打。26日，请愿和平代表到蒋介石“官邸”问吴：为什么要打内战？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吴鼎昌回答：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③表现了他对人民革命的极端仇视和恐惧。同年6月，他与宋子文拟定“战后经济事业制度”，8月任国民党政府制宪“国大”筹备委员会委员。1948年5月伪行宪“国大”召开后，吴改任蒋介石的伪总统府秘书长。12月，熊式辉、张群等在上海筹备新政学系组织——“笃行社”，吴前往参加了筹备大会，但当时因蒋军在淮海战役中已经惨败，结果纷纷作鸟兽散。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时，吴鼎昌趁机辞去了秘书长职务，将其财产变作黄金美钞，逃往香港作寓公。

吴鼎昌的一生是极端反动的一生，是为北洋军阀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忠实效劳的反动政客，是政学系的财阀之一，也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的附庸，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因此被人民宣布为头等战犯的第十七名。

1950年8月22日，吴鼎昌病死于香港。

(熊尚厚)

注：

①《国闻周报》，1933年10卷1期。

②1946年2月27日新华社记者评吴国桢关于学生游行的撒谎谈话。

主要参考资料：

王芸生、曹谷冰：《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61页，第26辑第208—277页，1962年1—2月北京中华书局版。

徐铸成：《旧〈大公报〉三巨头杂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44—47页，1963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版。

徐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第51页，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7月再版。

盛 宣 怀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生于1844年11月4日（清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盛家是个世代官僚地主家庭。

1860年，当太平天国革命势力发展到江南地区时，盛宣怀随祖父母至其父盛康湖北粮道任所。1866年，盛宣怀回籍应童试，补县学生。翌年秋试未中，以后屡试不第。

1870年春，李鸿章奉命督师入陕，进攻回民起义军。盛宣怀经杨宗濂推荐，投入李鸿章幕下，以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的父亲和李的关系深厚，盛宣怀迅速获得李的信任。同年秋，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自此以后，盛宣怀不断受到李鸿章的提拔：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复任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

盛宣怀是李鸿章举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早在1872年，他就向李鸿章建

议“由官设局”，“试办招商”，①成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他参与了最初的筹划。翌年，李委他任招商局会办，直接经手具体业务，打破了官不经商的成例。1876年冬，盛宣怀为招商局活动到一笔官费，出高价归并了濒于破产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并从中贪污了一笔手续费，而招商局营业却更加困难，摇摇欲坠。盛宣怀因此遭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奏参，被迫在1881年离开了招商局。1883年，李鸿章重新派盛宣怀入局。1885年盛升任该局督办，全面控制了招商局，并成为招商局最大的股东。当时，盛宣怀以局产作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款三十万英磅来维持营业。以后又多次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来避免在竞争中倒闭。实际上，招商局只能充当外国资本的附庸。

盛宣怀又于1880年向李鸿章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筹办电报局，次年派为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在主管电报局期间，和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允许他们在中国沿海敷设电线，并在上海等海口登陆，让他们控制了沿海的电信权。

1893年10月，李鸿章筹办十年而开张才两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火焚毁，急派盛宣怀赴沪处理善后。盛重新招股，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担任该厂督办。当时，李鸿章经办的经济企业，多数归盛宣怀掌握。其中，华盛则被盛偷梁换柱，逐步变成了自家的私产。

1895年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因兵败被撤销直督职务，失去了北洋地盘。盛宣怀的地位也跟着发生了动摇，不得不请假离开天津，前往上海，打算另谋出路。他曾企图弃官就商，在工商业上大干一番。恰好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汉阳铁厂亏空太大，束手无策，商请盛来接办。盛向张提出，如接办铁厂，须同时组织经办芦汉铁路的公司，以保证汉阳铁厂所产铁轨的销路。张之洞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1896年5月，盛宣怀首先接办了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1897年起，又兼营萍乡煤矿），改为官督商办。同年8月，张之洞与直督王文韶会奏保荐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10月，他又亲自进京活动。结果，清廷委他经办的不只是芦汉铁路，而是全国性的“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且，他还获准主持开设通商银行。这时，他才轻松地卸掉了天津海关道的职务。

1897年1月，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不久，通商银行也在上海开办。从此，盛宣怀的活动中心便从天津移到了上海。此后，他以铁路总公司为枢纽，遥控汉、冶、萍铁煤厂矿，近制轮电、纺织及银行业务，声势十分显赫。张之洞、王文韶在保举盛的奏折中曾称赞他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一身而兼“三长”。^②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盛宣怀是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铁路总公司成立后，盛宣怀一面开工建造芦汉铁路芦保段和淞沪铁路，一面立即筹借外债。他的方针是“造成一段”，就“抵借一款”。^③1897年7月，盛与比利时正式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1898年，比在俄、法支持下，寻找借口，推翻合同，进一步向中国勒索利权。盛不得不与比改订了合同，使比利时获得贷款的高额利率，并攫得芦汉铁路的建筑权和行车权。同年，盛宣怀又与英国签订了沪宁、苏杭甬、浦信铁路的借款合同草约（浦信路约后来实际作罢），与美国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后于1900年签订正式续约），其条件较比利时的更为苛刻。盛宣怀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充当买办。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盛宣怀多次密奏清廷，主张对义和团实行血腥镇压。八国联军入侵后，他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运动“东南互保”，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保护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事后，清廷西太后十分赞赏盛宣怀在东南互保中所起的作用，夸奖他是“不可缺少之人”。^④1901年1月，盛升任为会办商务大臣，驻沪办事。同年10月，又任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奉命与各国进行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的谈判，希望以出卖内河航行权、增辟商埠、裁撤厘金为条件，乞求列强增加关税。经几年谈判，终因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违背，遭到列强反对，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1902年起，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依仗权力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电报、轮船两局。从此，盛、袁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利害冲突。1903年7月，盛宣怀与英国把前签订的沪宁铁路借款草约改为正式合同。其后不久，湘粤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前与美国订立的粤汉铁路合同，收回自办。1905年，张之洞在

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废除美约，盛则反对废约。因此，盛宣怀与张之洞之间发生争吵，盛由此失去了张的支持。继而，江浙两省资产阶级也要求废除与英订立的沪宁铁路合同及苏杭甬铁路草约，并发展为声势颇大的收回利权运动。至此，盛宣怀不得不口头上声称赞成废约，而实际上却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废约运动。盛的卑劣手段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是年11月17日，经商部奏请清廷改派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接管沪宁铁路。不久，铁路总公司也被裁撤。盛宣怀在人民的唾骂声中黯然下台。

到1907年底，由于浙江地区人民要求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的运动仍在扩大，西太后乃召盛宣怀进京，研究对策，盛仍力主维持原约。

1908年3月盛宣怀被任为邮传部右侍郎，但未到任即奉命出都。他在京时，曾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正式合并，改为商办，于3月26日在农工商部正式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由他担任总理。

先是，盛于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时，仅凑得股份二百万两，根本不足以扩大生产，只有依靠借债经营。为了使铁厂获得廉价的焦煤，他曾于1899年向德国贷款四百万马克购买采煤机器，扩大萍煤生产。1904年11月，他又以大冶得道湾矿山作抵押，以廉价供应日本优质矿石为条件，向日本预支矿石价款三百万日元，用以改造和扩大汉阳铁厂。他把这笔贷款看成是“无中生有，一线之生机”，^⑤而实际上，却是把日本财阀的势力引了进来。到1907年底，汉冶萍公司成立前夕，厂矿设备确已初具规模，但在盛的一手包办下，经营腐败，债务累累。公司成立时，盛声称“加集巨股，大举合办”，^⑥以扭转亏空局面，但事后集股仍然十分有限。由于营业上继续出现巨额亏空，公司濒于无法支持。1908年9月，盛宣怀去日本治病兼行考察，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与日本财阀相勾结。到11月间，由于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盛匆促回国。

1910年8月，清廷召盛宣怀进京，回邮传部右侍郎原任，并要他“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实际上，清政府要他出面向帝国主义国家借钱，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盛立即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先后谈判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1911年1月，他补授邮传部尚书。不久，和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四

国银行团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同年5月，随着清政府宣布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命令，盛又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把原先已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奉送给帝国主义。

所谓“铁路国有”，是由盛宣怀策划奏请，由清政府批准实行的。清政府通过铁路国有政策，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乞求帝国主义的贷款。但是，这一卖国政策立即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盛宣怀成了万人唾骂的对象。保路运动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在革命洪流的震撼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0月26日将盛宣怀革职，盛的反对者们乘机要清廷将他“明正典刑”。惊惶失措的盛宣怀赶紧向其外国主子求救。革职后的第二天深夜，他在英、美、法、德、日五国驻京使节分别派兵护送下，经天津乘德国轮船逃往青岛。12月下旬，盛为了投靠日本，移居大连。

盛宣怀在逃亡青岛、大连期间，仍密切注视着时局的演变。他消除了对袁世凯的宿怨，通过亲家孙宝琦的关系，一再为袁镇压革命、篡夺政权出谋划策，为袁的一举一动拍手叫好。

当时，盛宣怀在江苏等地的财产，被革命当局查封。为此他曾无耻地恳求外国驻华使节出面保护他的财产。但当他投靠日本之后，其他各国对他的“热情”已经冷却，不愿为他出力。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盛宣怀认为，“商产恐非洋债，终难保全”。^⑦他打算重新组织汉冶萍公司，以便进一步引进日本资本，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来保护他的财产。为此目的，他于1912年1月3日，亡命日本。

盛宣怀逃到日本后，日本当局看到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认为有机可乘，唆使盛宣怀与南京临时政府接洽，提出愿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贷款五百万日元给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准许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这个办法，是要让盛宣怀与革命政府搭上线，改变他的卖国贼身份，也是让日本获得实际利益。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急于获得革命军事经费，同意了这一要求。1912年1月29日，盛宣怀指派其代表在神户和日本签订了中日合办汉冶萍的合同。但消息一经传出，一些党派和社会輿

论即表示坚决反对，孙中山乃毅然宣布取消前议。在上海的汉冶萍公司股东会于3月开会，一致反对中日合办，撤销了盛宣怀的公司总理职务。中日合办汉冶萍的图谋终于失败。

其后，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掌了权。盛宣怀以赈灾为名，独捐银元一百万元，向袁表示效忠。1912年10月，他从日本悄然回到上海。盛宣怀回国后，立即要求发还财产。他在为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呈文中，公然气势汹汹地诋毁革命，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是年12月10日，在所谓“保护人权”的幌子下，以报效水利经费二十万元为条件，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的全部财产。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又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污蔑这次革命是“革命流毒忽又剧作”，^⑧一再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宣怀还乘机向袁表示忠心，吹捧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乎有过无不及”。^⑨

但是，盛宣怀对袁世凯的献媚，并没有获得袁的青睐，袁不愿和这个已经无用的宿敌和解。盛在袁政府内部寻找靠山的目的既没有达到，他经营汉冶萍公司在政治上就缺乏依靠，因而不复享有从前的种种特权；而且，经济上还遭到中央和地方当局的侵蚀，使营业更为困难。于是，他一方面虚伪地提出了“国有”或“官商合办”的主张；另一方面，决心更进一步投靠日本，以便依靠日本的力量，来迫使袁世凯政府给予更多的特权，迫使袁政府不敢实行国有或官商合办。1913年12月，盛宣怀与日本财团签订了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贷款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大借款合同，规定长期供应日本廉价的生铁和铁砂，并由日本派遣顾问来监督企业。这样，由于盛宣怀的引狼入室，中国这一煤铁联合企业，便深深地陷入了日本的魔掌之中。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又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归中日合办。当时，日本方面曾派专人来华，和盛宣怀密商中日合办问题。但因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盛不敢贸然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的阴谋又一次破产。随后他又和日本策划搞一个中日合办的钢铁公司。但是，这个策划还没有来得及实

现，盛宣怀就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死。

(朱宗震)

注：

①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附录：行述》。

②张之洞：《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四，第24页。

③盛宣怀：《寄张香帅》，《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五第29页。

④同①。

⑤盛宣怀：《寄京外务部张宫保、鄂端午帅》，《愚斋存稿初刊》卷六十二第7页。

⑥盛宣怀：《汉冶萍煤铁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折》，《愚斋存稿初刊》卷十四第15页。

⑦《盛宣怀致王子展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

⑧《盛宣怀致孙宝琦函》，同⑦。

⑨《盛宣怀复孙宝琦函》，同⑦。

赵 秉 钧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生于1859年2月3日（清咸丰九年正月初一）。他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巡警特务头子。

1878年，他考秀才落第后，投入左宗棠所部楚军，随军进驻新疆。1883年，在伊犁担任勘划中俄边界办事员，由于“边防出力”，被“保以巡检遇缺即选”。①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 to 省。二年后补新乐县典史，1895年调署东明县典史，1897年调署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并署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1900年至1901年，率领巡防营在京津一带血腥屠杀义和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委派他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并奏保他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仍留直隶补用。

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后，认为他“才长心

细”，②于1902年初派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创办巡警，并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和袁世凯的警务顾问三浦喜传（日本人）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募巡警，迅速地成立了一支有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成绩昭然”。③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同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之一是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把新军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然后率领巡警一千五百人进入天津城，担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在伊藤和原田的指导下，他又创办天津侦探队（后改为探访局）和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他将天津和保定两所巡警学堂合并，更名北洋巡警学堂。此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监视和迫害人民。他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④以推行“猛治”，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03年3月，袁世凯奏保他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8月奉旨照准。

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10月巡警部成立，经袁世凯奏保，赵秉钧担任巡警部右侍郎。他的特务才干超过其主子袁世凯和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对北京的警政，他“事皆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⑤次年1月，他奏请从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把北京的警政抓到手，使原来在北京办巡警的肃亲王善耆“地位颇危，仅能自保”。⑥他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人民受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都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动静也在注视之列，所有重要情报都能及时地送到袁世凯手里。这样，他便一跃而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工头子。

1908年底，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满族少壮亲贵与袁世凯集团的矛盾激化，次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河南彰德“养病”。善耆乘势夺取北京的

警权。3月，赵秉钧也被休致，闲居天津，时常往来彰德，与袁世凯暗通消息，窥测时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彰德参与袁世凯的窃国密谋。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他担任民政部大臣。当时，满八旗兵多调入北京城内，扬言要屠杀汉人，人心惶惶，局势混乱。他奉袁世凯之命先入北京，利用自己的旧势力，在姜桂题所部毅军的支持下，把新调进的旗兵“一律遣回城外汛地”，撤出旗籍巡警，强令商店营业，戏院开演，迅速地恢复了秩序。

袁世凯为了逼迫清帝退位，从1912年1月中旬就称病不复入朝，内阁所有奏折及请旨都由赵秉钧和梁士诒、胡惟德三人往来传述。1月19日，他们代表袁世凯列席亲贵王公讨论退位的御前会议，赵秉钧提出内阁解决时局的方案，即：清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当场遭到激烈反对。他很不耐烦地说：“此案实为内阁苦心孤诣于万难之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见纳，除了袁内阁全体辞职，别无办法了。”说罢扬长而去。以后，他和梁、胡多次入朝逼宫，隆裕太后曾哭着要求他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他又陪着大哭，并“誓言保驾”。^⑦

清帝被迫退位以后，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唐绍仪组织内阁，赵秉钧任内务总长。赵秉钧深知袁世凯和同盟会的妥协只是一种策略手腕，当唐绍仪提出在内务部司员中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时，他坚决反对，说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他便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而且从此拒不出席由唐召开的国务会议。问其理由：则说：“会议关系本部之事甚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

不久，袁世凯逼走唐绍仪，赵秉钧暗中唆使北京军警会议召开特别会，威胁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陆征祥内阁国务员名单，他仍连任内务总长。8月间，陆征祥因受参议院弹劾，称病请假，赵秉钧奉命代理。此后，为了骗取同盟会领导人的信任，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请人代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同时对应邀进京的孙中山和黄兴极力表示亲热。9月，袁世凯准陆征祥辞职，提出赵秉钧由代理改为实任。当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企图通

过赵秉钧实现“政党内阁”主张，便在参议院国民党议员中极力疏通，使赵内阁很顺利地通过。赵秉钧仍兼任内务总长。与此同时，外交总长梁如浩、农林总长陈振先、司法总长许世英都表示愿加入国民党。本来已宣布脱离同盟会的工商总长刘揆一也表示愿恢复党籍。因此，赵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但对这个“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当时“人多非笑之，谓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⑧

内阁成立不久，赵秉钧就变了腔调。当有人问他加入政党的事时，他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政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有人说亲眼见他送到统一党和同盟会中的党证。他则摇着头说：“此恐怕不是我写的吧！”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然而，不久他就把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召开，一切听命于袁世凯，使内阁变成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工具。

1913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独占优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赵秉钧马上意识到自己权位有被夺走的危险，便和袁世凯一起策划暗杀宋教仁的阴谋活动，但在表面上他反而对宋教仁特别友好。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伤势很重，延至22日逝世。不几天，正凶武士英及谋杀犯应夔丞被捕，在应夔丞家中搜出赵秉钧给应的密电码一册和嘱应“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之密函一件，又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示应行刺的函电多件，而且在洪致应的函电中，有多处提及袁世凯和赵秉钧指挥暗杀事，如：“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又：“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又：“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等。这些证据一被公布出来，宋案真相大白，举国人心震动，舆论哗然。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上海法庭传赵秉钧出庭对质。赵秉钧拒不出庭，装出一副无辜受连累的样子抵赖说：洪致应函电从未阅过，完全是洪假托名义，“招摇”或“隐射”。又装腔作势地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

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由于总统一再敦促，才出来帮忙。后来，南方国民党人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臣，与洪述祖究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要我“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泉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血口喷人”。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发动特务机关制造假案，反诬黄兴组织“血光团”，派遣团员来京暗杀政府要人，授意北京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尽管赵秉钧使用了这些鬼蜮手段，终不能掩盖事实真相，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引嫌自请免官。袁世凯批准他请假十五日。后来，他一再续假，直到7月16日袁世凯才准他辞职，而让段祺瑞代理总理，组织“战时内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次日，赵秉钧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21日又担任了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对京津一带反袁的国民党人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以后，赵秉钧于12月16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1914年初，自上海越狱脱逃的应夔丞来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世凯密令，于1月19日在京津铁路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这条乏走狗的性命。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在电话中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⑨袁世凯装作不知内情，2月19日又让他兼直隶民政长。但是，没过几天，即2月27日，他在天津督署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⑩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世凯“遣人置毒羹中，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

对于他的死，袁世凯假装非常痛惜，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赴津治丧，特发治丧费一万元，并送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1915年底袁世凯作皇帝，又追封他为一等忠襄公。 （李宗一）

注：

①《赵秉钧履历单》光绪29年11月。

②袁世凯：《道员赵秉钧请饬交军机处存记片》，光绪31年8月13日。

- ③同②。
④同②。
⑤《大公报》，1907年2月6日。
⑥《汤睿致康有为书》，1908年。
⑦凤冈及门弟子编：《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111页。
⑧黄远生：《远生遗著》卷2，第153页。
⑨《孤愤数袁氏罪恶之种种》。
⑩《陆锦致袁世凯电》，1914年2月27日。

德穆楚克栋鲁普

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字希贤，1902年2月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生于察哈尔部正白旗。他的父亲那木济勒旺楚克，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郡王。1908年那木济勒旺楚克逝世，锡林郭勒盟盟长按照蒙古王公世袭制度规定，报请清廷注册由德王袭苏尼特部右翼旗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①。因德王尚在幼冲，全旗政务暂由协理台吉代为主持。德王在王府特设的家塾读书，除学习蒙古语文外，还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经史典籍。

1912年，德王由北洋政府进爵一级，晋封为札萨克和硕杜棱亲王。

1919年，德王年满十八岁，依照蒙古王公世袭的规定，王府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仪式，他正式执掌札萨克亲王政务。

1924年，锡盟盟长杨桑因年迈多病离职，副盟长索特拉木诺布坦（以下简称索王）继任盟长，德王升任副盟长。11月溥仪被逐出故宫后，于次年2月逃往天津，德王偕同锡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赖暗赴天津日租界张园拜会溥仪，对他被逐离故宫深表同情，并献一万银元，表示“忠君”之意。以后又精选蒙古良种马，赠溥仪的弟弟溥杰。

1925年2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德王代表锡盟王公出席，会议期间被任命为善后会议委员、临时参议院参议。在此期间，德王接触了许多政

界上层官吏政客，知道了不少统治之道。返旗后提出所谓“改革旗政”的措施：扩编蒙旗保安武装；兴办牧区学校、卫生和毛纺工业机构；为扩大兵员，号召不懂经文的青年喇嘛还俗。他的这些举动，遭到老年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强烈反对，说：“苏尼特右旗如今出了个疯王，要改革祖宗留下的成规，还要喇嘛还俗哩！”^②。

1926年，德王继旗保安队扩编后，又新建一支拥有五百余名兵员的“乌滂守备队”，担任张家口至滂江地区的护路任务，每年向察哈尔都统府领取兵员补充经费四千银元^③。

1929年，德王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秋，随同班禅赴沈阳要求张学良拨发武器，适逢蒙古青年党党魁郭道甫（呼伦贝尔达斡尔人，时任齐齐哈尔蒙旗师范学校校长）亦在沈阳。他向德王献策说：“为什么外蒙古的独立会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就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现在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古地方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做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④

经郭道甫启发，德王返锡盟后，即提出为班禅建庙，挽留班禅在内蒙久居。他的这个创议，首先取得盟长索王的同意，又联络各盟旗王公，共同集资在锡盟、乌盟等地建起宏伟的班禅寺庙。

1930年10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中原大战失败下野。冬，阎派亲信赵太东、仲跻翰前往外蒙古，途经德王所辖旗的边境时，被旗防卡哨所扣留，从赵、仲身上查获阎锡山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信，内容为：阎想取道外蒙古潜赴其他地方避难。德王当将此事连同查获的信件，向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和张学良等报告，由他们转报蒋介石，从而获得了蒋的重视。

1931年夏，德王偕同补英达赖赴北平，要求拨发保安队枪枝弹药，日本特务盛岛角芳也尾随去平，同在北平的日军教授英德佐等一起，设宴招待德王，进行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日寇和德王的内外压力下，称病离职，德王掌握了代理盟长大权。10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发“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11月26日，德王联合哲、乌、伊三盟盟长，致电南京国民政府，

反对“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⑤。同时，又派补英达赖去南京联络包悦卿（赛音巴雅尔，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等人，大肆吹捧德王是“素符众望，洽顺輿情”的蒙古当代领袖人物，要求国民党中央派他出任“蒙旗宣抚使”。德王亦亲自出马，到北平邀请班禅到他的旗里过冬，以取得班禅的支持。

是年冬，日本关东军将官林銑十郎、松井石根二人写信给德王，介绍日本特务笹目来苏尼特右旗，充当日本关东军和德王暗中勾结的联络员。经德王掩护安置，笹目便冒充喇嘛，潜伏寺院，长期进行特务活动。

1932年秋，蒋介石派桂永清等，在包悦卿的陪伴下，由南京前来苏尼特右旗拜访德王，德王为了取得蒋介石的支持，对桂等格外殷勤招待。桂永清给蒋介石打电报推荐德王说：“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⑥桂等返南京后不久，蒋介石来电邀德王到武汉会见，他即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等前往武汉。蒋给德王“蒙古保安统监”的职务，德王想取得统治蒙古的政权和军权，不愿受此虚衔。由武汉返回北平后，就打出“团结蒙古各阶层，复兴民族”的旗号，与在北平的各盟旗王公、青年等联系，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请愿，发动反吴鹤龄（时任蒙古各盟旗驻京联合办事处长）的活动，均未如愿。转而借“九一八”事变后的混乱局面，乘机提出所谓“内蒙高度自治”的要求，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1933年春，德王在他的旗王府西营盘，成立蒙古干部学生训练队，将在北平等地招来的二十余名蒙古青年学生^⑦，同各旗遣送来的七十余名蒙古青年编队训练。委云继先、于福赓二人为教官，把从武汉、南京向蒋介石要来的枪械拨归该队应用，为他培养政治军事的后备基干力量。7月，德王在班禅的支持下，征得盟长索王的同意后，赴乌兰察布盟喀尔喀右翼旗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所在地），面见乌盟盟长云栋旺楚克亲王，共商倡导“内蒙高度自治”。7月26日，以锡、乌、伊三盟各旗王公名义向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军委、蒙藏委员会等发出请求“自治”的通电。10月，在百灵庙举行第二次自治会议。锡、乌盟、归化土默特等各旗王公和伊、察二盟、青海、宁夏所辖蒙旗部分王公代表及旅北平、南京等地的蒙古王公、青年代表等出席会议。会上通过“推行自治真相通电”和“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等决议。

南京国民党中央接到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后，一面指令察、绥两省当局使用“恩威并用”的手法，分化、劝阻各旗王公“自治”活动；一面派出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等人蒙宣抚，瓦解“自治”。

1934年元月，黄、赵返南京后，德王对黄、赵所拟察、绥两省各设一自治区的“内蒙自治办法十一项”深为不满，当派尼玛鄂特索尔、僧格林沁、哈斯瓦齐尔等赴南京请愿，反对“自治办法十一条”，坚持要求实行“统一高度自治”。

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接见吴鹤龄和请愿代表团成员，责成由吴鹤龄草拟“蒙古自治八项原则”。当经蒋介石批准，3月7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并指定何应钦（军政部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为指导长官，赵戴文（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为副指导长官，监督“自治”活动。

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宣告成立，由乌盟盟长云王任“蒙政会”委员长，锡盟盟长索王、伊盟盟长沙王任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而实际上正副委员长均为名誉职务，“蒙政会”实权完全操于德王一人之手。是时，日本关东军特务笹目由苏尼特右旗返回日本，报告他进行德王工作的情况。不久由日本返回，向德王馈赠收音机、电台等物。不久，东京善邻协会理事长井上璞由日本前来访问德王，并在苏尼特右旗贝子庙（今锡林浩特）设善邻协会分会，以拉拢各旗王公，掩护特务活动。同年夏，日特盛岛角芳潜来百灵庙，代表关东军“赠给”德王步枪二千枝。^⑧

1935年夏，德王赴北平要挟何应钦说：“现在日本人进出西蒙，势甚猖狂，……我甚感力量薄弱，无法抵抗，只有依照蒋委员长指示，用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日本人，苦心孤诣地来应付。我这个勉为其难的苦心，反为外界人士误解，使我至为难过。唯今之计，只有请你拨发武器，编练军队，准备抗日力量，以资御侮图存。”何应钦回答说：“你的苦心孤诣……妥慎应付局面的情形，我们是知道的，外界误解或疑猜，希不必介意。至于请拨武器……一节，我认为无济于事，中央有些军队还抗不了，你们蒙古训练一点军队顶什么用！……”^⑨其后何以“蒙政会”指导长官身分去德王住处劝慰一番，赠送银元一

万元。

此时，德王与日寇的勾结阴谋已经十分明显，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注视和愤慨，但因得蒋、何等人的默许，德王有恃无恐，阴谋活动愈加频繁。同年7月，日本关东军派小野寺少佐给德王送来飞机一架。9月，日寇为实现侵绥西犯计划，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偕同渡边大佐等前来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与德王会谈。德王提出：“建立‘蒙古国’的问题，希望日本帮助早日实现，并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坂垣当即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是愿意帮助的。但东部蒙古是满洲国的领土，满洲国是独立国家，我无权答复。为帮助你们筹划建国，可先派三个顾问来。”^⑩当因盟长索王反对日本派顾问来蒙，德王未表可否。10月，关东军特务中岛万藏、中泽大喜、陶克陶、金永昌等来百灵庙促德王“与日本正式合作，希望早日做出决定”。11月，德王偕同外蒙逃来活佛迪力瓦和日特穴浦、中岛万藏等飞往长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坂垣征四郎等密谈所谓“日蒙合作”问题。会谈中德王又提出：希望日本帮助先在内蒙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实现蒙古统一建国。坂垣等答复：日本尽快帮你先在内蒙西部地区搞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独立的“蒙古国”。德王返回苏尼特右旗王府后，即同日本特务机关长穴浦等积极策划改元易帜，在察北建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为“蒙古建国”开创“独立”局面。^⑪

1936年2月21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科长云继先等，乘德王在察北组织军政府、改元易帜之际，率百灵庙保安队官兵千余人暴动兵变后离去，后被傅作义派武装包围，强制缴械改编。^⑫

4月24日，德王在日寇的直接指使下于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伪蒙古大会。5月12日，又在嘉卜寺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自任总裁，并改化德县为“德化市”。为扩充武装，德王将伪蒙古军扩编为两个军，分九个师和炮兵团、宪兵队等，军费、武器由关东军供给。

1937年5月，日本关东军调河崎大佐任“德化市”特务机关长。为充实调正伪蒙古军，取消第一、二两军的建制，改由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7月，“芦沟桥事变”后，日寇为集

中兵力进攻平、津等华北地区，对德王所占的察、绥地区暂无暇顾及。傅作义命董其武率绥远军乘虚向商都、“德化”等察北地区发动进攻。德王闻讯后犹如惊弓之鸟，一面下令伪“蒙古军政府”由“德化”撤往多伦，一面他先乘飞机溜回苏尼特右旗王府。8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机械化精锐部队由古北口经多伦向张家口以西地区沿平绥铁路西犯。东条到达多伦后，对德王弃守“德化”甚为不满。此时，德王、李守信又整顿伪蒙古军配合日寇向绥远地区进犯。10月，日伪军进占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德王、李守信、吴鹤龄率伪蒙古军政人员到绥。11月27日，德王等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东条亲临操纵，指定云王为名誉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长（1938年3月云王病逝，德王继任伪主席），下设总务、财政、保安等部。日寇为全面控制伪蒙各级政权，特设日本顾问部，派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下设总务、财政、保安、军事各顾问多人。这些日本顾问实为操纵伪蒙军政大权的太上皇，德王、李守信等无不仰其鼻息行事。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为了取得各盟旗王公对他的支持与拥护，巩固他的统治权，对盟、旗组织进行了加强，首先强化盟的行政领导地位。在清朝时期，盟是各旗定期“会盟”的组织，不是一级政权机构，而德王除将所辖的锡、乌、察三盟改为行政单位外，又将原绥远省所辖十六县、二设治局，除划归乌、伊两盟部分县外，新设置了“巴彦塔拉盟”管辖五旗十县地区，并改归绥市为“厚和浩特”。

在军事上，德王为了使蒙古军由他直接掌握控制，除将伪蒙古军中由汉人编成的一、二、三师让李守信指挥外，其余六个蒙古人组成的骑兵师，统归他直接指挥。并对各盟旗伪保安武装大加扩充，拨发新式枪械装备，派遣他的亲信去充任教官，以便居中控制，使这些武装力量忠实于他。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日本已在察南、晋北相继建立了伪自治政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它侵略政策的需要，采取割整为零、分而统治的政策。此时，它为了加紧掠夺资源的需要，又采取并零为整、集中统辖的政策。同年11月22日，金井章二在张家口召集伪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代表开会，筹备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8年8月，日寇进一步改组强化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使它由三个伪政权协商机构，变为高居于三个傀儡政权之上的领导机关，而蒙古、察南、晋北伪组织，则降为地方性质的政府。对日本搞这个“合而为一”的“蒙疆”政权，德王深表不满。

同年秋，日本驻张家口军部决定让三个伪政权头目德王、李守信、于品卿、夏恭等由金井章二陪同赴日本访问。德王在日本会见内阁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时，将他与吴鹤龄研究提出的“蒙古建国”两个方案交给坂垣。但因此时日寇正利用汉奸汪精卫政治诱降蒋介石，对原推行分割统治中国的策略暂有变更，故不许再提“蒙古建国”。在天皇召见德王时，金井章二事先告诫他只许说代表“蒙疆”，不准再提“蒙古独立建国”等词。为此，德王深为不满。他由日本返回厚和浩特后，便鼓动各盟旗王公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要求实现“蒙古独立建国”。

1939年4月29日，日本军部通知德王来张家口就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德王到张垣后，与日本军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勉强就职，但觉得屈膝在日本脚下，做奴才的滋味不大好受，于是又暗中与蒋介石联系，表示他想脱离伪蒙，走向重庆。嗣蒋复电，嘱他“仍留蒙疆，忍辱负重，以图将来”^⑬。

9月1日，日本军部又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任命德王为伪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蒙疆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两个伪自治政府改为两个政厅，直隶伪政务院，撤销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所辖巴、察、锡、乌、伊五盟，也直隶伪政务院。并制定黄、蓝、白、赤四色七条旗帜，作为代表伪蒙疆政权的表征。

1940年春，德王等与蒋介石暗中联系事被日本军部侦知，德王、李守信亲到日本军部坦白，取得谅解。2月，德王等再次赴日本访问，向天皇裕仁表示感谢日本对蒙古的支援。时日本陆军省告德王，要吴鹤龄回来任蒙疆政府伪政务院长，德王又与吴策划提出改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方案。

1941年，在日寇的导演下，伪“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日本人）赴青岛与南京汪精卫伪中央政府代表周佛海等签订蒙、宁协议书：

“蒙疆政府承认‘新中央政府’（即汪伪南京政府）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汪伪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高度自治’政权。”^⑭但德王对汪精卫居于他的上司地位，统辖“蒙疆”表示不满，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的合作。他说：“今天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儿子，但不能做它儿子的儿子。”^⑮6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身分到张家口视察，德王称病不去机场迎接，引起日本军部的不满。9月，在日寇指使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等来张家口进行“敦睦友邻”访问。

1942年，日寇为策划伪蒙古军配合发动对华北地区的大扫荡，日本侵略军首脑东条英机乘专机由东京前来张家口给德王打气鼓劲，并赠送他日式三八步枪五百枝，要他组织卫队武装用。嗣日寇为配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我察、绥抗日根据地发起疯狂大扫荡，实行极其残酷的绝灭人性的“三光”政策。德王到前线亲自督战，指挥伪蒙军积极充当日寇的帮凶，大肆烧杀掠夺，在各族人民中犯下滔天罪行。

德王长期以来梦想做“蒙古大皇帝”，他曾向驻“蒙疆”日军部司令官莲治蕃提出：要求“皇军”协助把“满洲国”所属的呼伦贝尔、昭乌达、哲里木盟等蒙古原有疆域，重新划归“蒙疆”统辖。莲治蕃回答说：“满洲国是蒙疆政府最亲密的盟邦，目前还不宜有此交涉。皇军赫赫战果，不久就会结束在支那的战役，那时皇军就会替你收复外蒙，你就是全蒙古的大皇帝了。”^⑯德王与日本几番讨价还价，迨至希特勒武装进攻苏联以后，日本为适应它侵略政策需要，遂允许德王对内改称“蒙古自治邦”，对外仍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8月4日，改换招牌，宣告“蒙古自治邦”成立。但这次伪蒙机构改组后，大批的日本人由原来顾问、参与官等幕后牵线人的地位，变为直接担任各级主管，现身为前台的官吏，把原有各厅、部、院、委中的一批伪蒙官吏，从主管岗位上排挤出去，变成闲散伴食的傀儡。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伪蒙政权的控制，在张家口设立兴亚院联络部，作为日寇统治“蒙疆”的最高指挥机关，联络部长官酒井隆等人，是日寇驻“蒙疆”的太上皇。至此，“蒙疆”地区完全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43年元月17日，德王奉日寇旨意，发布第二次“兴亚教书”，追随日寇为挽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厄运，以“大东亚共荣共存”，坚决“反共剿共”为宗旨，对“蒙疆”地区六百余万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实行血腥的反动统治和镇压，在经济上进行抽髓吸血的压榨和掠夺，在文化思想上推行险恶毒辣的殖民奴化政策。

1944年秋，德王看到日本大势已去，为维护他今后的统治地位，一面整顿充实伪蒙武装力量，准备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争夺胜利果实；一面又同东蒙的玛尼巴达拉、朝克巴达尔夫等密谋：日本失败后，要把东西蒙联合起来，趁机组织所谓“蒙古自治国”，妄图把内蒙从中国分离出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日寇多年来扶植的伪“蒙疆”政权也随之彻底垮台。德王又使出“狡兔三窟”伎俩，派遣代表分别向苏蒙联军和重庆国民党政权联络，企图暂保伪“蒙疆”的破烂摊底和残存的实力，待机利用它来改头换面，再搞他的所谓“蒙古自治国”。德王这个阴谋遭到苏蒙联军拒绝。当八路军重兵包围张家口时，德王便同军统特务王野人、梁芝祥等于9月19日夜随同日本军队撤离张家口，逃奔北平。这时又接到蒋介石由重庆来电，委他担任“蒙旗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先遣军总司令。”^{①7}

德王到达北平后，为谋求“东山再起”，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赴重庆报告蒙情。经蒋同意后，9月末，德王、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一行到达重庆。德王向蒋介石面呈书面报告，“陈述内蒙危机状及拟具措置办法三项”，并对蒋正式准予外蒙古独立表示敬意。蒋介石拒绝德王提出再搞“蒙古高度自治”的要求，并分别委李守信为第十路军总司令，吴鹤龄为“蒙古宣导团”主任等，命他们即返北平等地收罗伪蒙残余武装，以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并告德王暂时“最好抱着缄默不言的态度，忍耐一时，徐图将来”，更不要再喊“蒙古要求高度自治”，^{①8}暂作“隐居”寓公。11月17日，德王只好接受蒋介石给他每月五十万元生活费和“不咎既往”的安置离开重庆，偕同陈绍武、策仁道尔吉、郭木布扎布等返回北平，表面上闭门谢客，不问政治，暗地里却又与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积极联络旧部伪蒙军政人员，等待时机，再搞

“蒙古高度自治”。

从1945年至1948年底，德王在北平三年的“隐居”生活中，通过各种渠道，加紧与美帝国主义勾结，除他亲自会见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李嘉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军政要员外，还委派迪力瓦等到美国等地为他呼吁“蒙古独立建国”。1948年秋，辽沈战役开始后，蒋介石由南京赴沈阳，途经北平时，德王去行辕见蒋，又提出要求“蒙古高度自治”。当时，蒋很颓丧地回答：

“如果共产党不消灭，民族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德王看出蒋情绪不好，便只好说：“是的，现在是戡乱要紧。”^⑩

1949年元月1日，北京解放前夕，经吴鹤龄的奔走活动，国民党派飞机将德王接到南京。是时，蒋介石告退下台，李宗仁任伪代总统。德王当向李陈述当前内蒙“危机”状况说：“东蒙受共产党煽惑，已成立内蒙自治政府，近日渐向西逼进。现仅存西蒙各旗，宜速成立一个联合机构，以便收容不甘共产党宰割而西来的蒙古王公、军队及青年，共同抵御共产党。”^⑪李当表示应允他的要求。元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党老巢时，德王随国民党中央由南京迁往广州。此时，野心勃勃的德王，认为国民党退缩西南，无暇顾及蒙古问题，而人民解放军当时还未到达内蒙西部盟旗，打算趁此时机，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到西部盟旗去再搞“蒙古自治”。元月25日，德王偕同达密林旺楚克、吉利占太、赵纳斯图等由广州飞往兰州，与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扎雅、蒙藏委员会专员何瑞五（何兆麟）、国民党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等人会晤，讨论“蒙古自治”，并分别拜会在兰州参加西北长官会议的各省军政头目马鸿逵、马鸿宾、包尔汉、陶峙岳等，要求他们帮助“蒙古自治”。

4月初，德王等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打电报邀已逃台湾、香港等地的李守信、德古来、吴鹤龄、札奇斯钦等前来。在讨论“自治区域”和“组织名称”问题时，德王等力主实行“蒙古统一高度自治”；而达理扎雅、白海风等认为当前条件下，能达到的区域只限乌兰察布、伊克昭盟和察哈尔右翼四旗及土默特、额济纳、阿拉善旗等范围，故主张实行“自治”不再加“高度”字样。4月13日，东拼西凑的“盟旗代表会议”召开，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推选德王等五人为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代表团。5月

8日，德王等抵广州，提出“要求内蒙古自治请愿书”和“自治”筹备经过报告，两次都遭到伪行政院长阎锡山拒绝。德王接连碰了阎的两次硬钉子，看到向阎乞求“自治”无望，转而找美国大使馆要求：“希望美国帮助枪械、经费、飞机等物，以便进行蒙古自治”，^{②①}并秘密会晤美国新闻处特务头子马滋。马滋当送来美制电台数部和七、八名经过特务训练的蒙古人，派往阿拉善旗西北部中蒙交界地区潜伏活动。时美国大使馆也派特务白智仁等随德王到定远营活动。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阎锡山看到形势危急，在美帝国主义策划下，转而想利用德王等在我国北部边疆进行反共活动。于是，由副院长朱家骅出面召见德王说：“你要求自治，不妨试办看看”，并让伪国防部、财政部拨发一万银元、二百枝步枪、五十枝手枪及弹药等武器，告德王速返阿拉善旗先组织蒙古武装，搞所谓“戡乱”活动。8月5日，德王在阿拉善旗召开伪蒙古大会，宣布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并以“大元帝国的文功武治”鼓动与会者为“民族复兴”出力。德王始任伪“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不久名誉主席伊盟副盟长阿王病逝，继任主席。嗣德古来、扎奇斯钦、吴鹤龄等看到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军，逼近兰州，他们要逃离定远营，德王特意嘱咐拟往美国的扎奇斯钦，为了争取美帝的支持，可以“相机办理，便宜行事”。

9月中旬，绥远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九·一九”起义，接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兰州、银川，向西北地区进军。德王不甘心失败，决定把伪“蒙古自治政府”迁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达理扎雅、白海风等认为大局已定，再迁出亦无益，内部遂分裂。德王于20日凌晨带随员二人离开定远营西逃至拐子湖与李守信等会合，并打算继续西窜青海、西藏活动，因酒泉、玉门一带已解放，未逞。为摆脱困境，德王一面派亲信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联络，一面派陶布新前往银川与宁夏省人民政府谈判。不久阿拉善旗达理扎雅等接受“和平解放”。德王通过其侄阿拉坦瓦齐尔的引线，于12月29日带随员四人，由拐子湖越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信约李守信等旧部二十余人相继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1950年2月27日，德王、李守信等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被逮捕，同年9月18日，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国监禁。

1963年3月30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获得特赦，并被安置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馆工作。1966年夏，德穆楚克栋鲁普因病医治无效，死于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卢明辉)

注：

①《清史稿》卷二百九《藩部世表一》，中华书局1976年10月版。

②《德王承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前后几件事见闻》，卢明辉：《墨尔根巴特尔访问录》稿。

③④⑥⑧⑨⑩德穆楚克栋鲁普：《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稿。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档案》卷1245号。

⑦卢明辉：《孙元丰访问录》稿。

⑪德穆楚克栋鲁普：《伪蒙古军政府成立经过》（回忆录稿）。

⑫《云继先等率部脱离百灵庙》，《中央日报》1936年2月25日。

⑬⑮⑯⑰德穆楚克栋鲁普：《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与瓦解》（回忆录稿）。

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档案》卷1188号。

⑱陈绍武：《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蒋介石的关系》，《内蒙文史资料》第一辑。

⑲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回忆录稿）。

⑳、㉑德穆楚克栋鲁普：《我搞所谓“西蒙自治”经过》（回忆录稿）。

王 占 元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县人，生于1861年2月20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青年时代投淮军刘铭传部当兵。1886年被保送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1890年毕业，投入宋庆的毅军，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往天津

小站投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被委为工程营队官。1902年，袁世凯着手扩充军队，以小站旧部为骨干，于保定编练成北洋常备军，王占元任步队第七营管带。第二年晋升为步队第一标统带。1905年，袁世凯、铁良奉命开始编练北洋陆军六个镇，王占元被提升为第二镇步队第三协统领。1906年王占元由副将衔补用游击，准以“参将留直补用”。1910年升为记名总兵。1911年4月，授陆军协都统衔。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的第三协随冯国璋南下镇压革命。10月27日，王部伙同他部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纵兵烧杀抢掠，极为残忍。11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军队攻陷汉阳，使革命军孤守武昌，陷于严重困难。王占元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晋级为第二镇统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长，驻保定。1913年春夏间移驻信阳，参与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3月，兼“豫南剿匪总司令”，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以白朗为首的反袁武装。^①4月，任湖北军务帮办。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王占元积极拥护，曾列名段芝贵等人的劝进电。10月，袁世凯授以壮威将军。12月底，云南护国军起义反袁，王向袁表示忠诚不贰，袁又授他以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1月，正当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而精神沮丧时，王占元还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的神话，向袁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②这种为袁世凯称帝捧场的丑行，成为当时人们谈话的笑料。2月18日，王占元又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的反袁士兵。^③

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授王占元以湖北督军兼民政长。王表面对黎恭顺，暗中附和实力派。不久，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5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在段的唆使下，串通各省督军，领衔要求解散国会，向黎施加压力。王占元曾与孟恩远一道列名通电。之后，黎特意召见王、孟二人，恳求他们向各省军阀进行疏通。5月下旬，段祺瑞被免职，九省督军宣布独立，王占元表面未曾列名，实际上仍然与各省军阀沆瀣一气。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日益明显地分化为直（以冯国璋为首）皖（以段祺瑞为首）两系，王占元站在直系一边。9月，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实力派，建立“护法”军政府，反对窃据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这时，直皖两系由于利益不一致，对护法各省的和战问题发生分歧。冯国璋依靠王占元等长江直系三督军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政策，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11月14日，北洋政府驻防湖南前线的两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的授意下，首先通电撤兵，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接着，18日，王占元又同李纯、陈光远、曹錕联衔发出相同的通电。在直系的和平攻势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挫，军事随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赶出长沙，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取得暂时优势，但由于皖系的牵制，对和战犹豫不决。

王占元为保持他在湖北的统治，对和战采取观望态度，企图左右逢源。1918年1月27日，打着“护法”旗号的湘桂联军攻占岳州，2月11日，冯国璋免去被联军击败的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的职务，由王占元兼代。^④王占元和江苏督军李纯以南北议和调解人的身份展开活动，示意联军勿再进逼。湘桂联军并无真正实力，总司令谭浩明为了争取湖北中立，向王做出“不入鄂境”^⑤的保证。南北对峙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錕成了直系首领。王占元附和曹錕、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1920年4月，他出席了曹錕为部署反皖系而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盟会议。5月，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前线撤兵北上，路经湖北时，王占元慷慨资助饷械。6月13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曹錕的示意下，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7月，王又乘直皖战争之机，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从而扩大了他在湖北的军事实力。

直皖战后，奉系张作霖把触角伸向长江中游，想方设法拉拢王占元。北京政府也想依靠他调解直奉两系间的矛盾。1921年4月，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曹錕、张作霖分别代表直、奉两系外，还邀请了王占元，一时称为“四巨头会议”。王占元在会上大肆吹嘘，捏称“湘川黔滇不日北附”，^⑥想以此向北京讨取更大的好处。当时，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立政府，王占元尾随曹、张等北方军阀一起通电反对。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烧杀抢掠，人民遭受惨重损失。因此，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一、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8月7日，王占元被迫辞职，携带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他经常往来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的活动才稍加收敛。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的训练总监，^⑦与孙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作垂死挣扎，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⑧但历史作了无情的回答：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国租界的保护。

王占元曾经用搜括来的钱，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⑨；在山东投资于纱厂^⑩、煤矿^⑪；在直隶投资于面粉厂^⑫、电力股份公司^⑬；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元；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乘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⑭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在北洋军阀中，王占元算得上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

1934年9月14日，王占元病死于天津寓所。

（张振鹤）

注：

①《时报》，1914年3月1日、3日、13日、23日。

②《时报》，1916年1月17日。

- ③《民国日报》，1916年2月25日、26日。
- ④《大总统冯国璋命令》，《时报》，1918年2月14日。
- ⑤《李纯主张停战议和电》，《时报》，1918年2月5日。
- ⑥《章太炎致赵恒惕电》，《民国日报》，1921年5月10日。
- ⑦《申报》，1926年9月9日。
- ⑧《申报》，1926年9月14日、15日、16日、17日、26日。
- ⑨郑廷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66—267页，中华书局，1964年。
- ⑩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54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
- ⑪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山东矿业报告》，第164页，北洋印刷公司，1930年。
- ⑫河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第130页。
- ⑬《保定工商业状况》，《工商月刊》第7卷，第4号，第65页，1935年。
- ⑭同⑨第261—265页。《时报》，1921年8月12日。

陆 费 逵

陆费逵，字伯鸿，幼名沧生，祖籍浙江嘉兴，1886年9月17日（清光绪十二年八月廿日）生于陕西汉中。父名芷沧，曾在直隶、汉中、南昌等地做官。陆费逵从小由其母教授经书。1898年戊戌变法后弃旧学，自学史地、算术等新学，并入南昌英语学塾学英语，常阅读新书新报。1902年，在南昌与人合办正蒙学堂，任堂长兼教师，不久由于经费支绌停办。次年去湖北武昌任塾师。1904年，在武昌与人伙设新学界书店，任经理，与革命党人往来，并在书店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和其它新书。1905年著《岳武穆传》，抒发反清革命思想。同年夏，革命党人刘静庵借圣公会附设阅报室取名日知会，为革命活动基地。陆费逵曾为日知会起草章程，并参加日知会的革命活动。1906年3月，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是年秋，辞新学界书店经理，与张人杰、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楚报》，任主笔。同年底，该报因著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逮捕刘静庵等人，陆费逵躲过军警的搜捕，只身逃赴上海，在昌明书店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此后他即脱离革命活动，走上教育、

文化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①。

1907年冬，陆费逵改任上海文明书局襄理，兼文明小学校长、书业商会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及《图书月报》主任。次年，转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越明年，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曾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教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意实利教育^②，对旧教育制度提出过一些改革意见。同时，他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汉字。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他曾为该会起草章程。次年秋，商务资金周转不灵，营业一时萎缩，他乘机与商务同人沈知方、戴克敦、陈恭协等筹集资金，暗中编写新教科书，计划另创书局。

1912年1月，陆费逵与沈知方等以资本二万五千元合伙创设中华书局，他任局长，沈知方任副局长。中华书局开办后，陆费逵提出“用革命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口号，以商务为竞争对手，出版新学制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刊五色国旗作封面。次年，他又聘范源濂为编辑长，梁启超、王宠惠任编辑，编辑中学、师范新教科书。又与各地绅商协议合作，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中华书局分局。他还收买商务编辑人员，在报上揭发商务与日商合办的内幕，并派员赴日考察出版业务，同商务展开激烈竞争。1914年10月，陆费逵任上海书业商会主席。1914年到1916年间，他拉拢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等为中华书局董事，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并出《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又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总店，增设发行所，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一时营业甚为发达，年盈利额逾一百万元。到1916年止，印刷厂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分店近二十处，职工千余人。这时，中华书局成了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

1917年6月，中华书局因扩张太快，以致资金周转不灵，宣告搁浅。嗣经各方设法，得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投资，同年12月改组董事会，由吴镜渊派俞仲还为驻局董事。陆费逵被董事会卸去局长职务，责成其司理局务。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后，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与改造》、《学衡》、《少年中国学刊》和《中华书

商月报》等杂志，又于青岛、九江、梧州、兰州、香港等地增设分局。1926年，中华书局资本增至二百万元。

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后，孔祥熙于1930年担任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陆费逵为投靠孔系官僚资本，迎孔入中华书局任董事长。中华书局在官僚资本支配下，于上海澳门路建筑新厂，扩充印刷所，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政府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1932年，商务印书馆因上海“一二八”事变遭受重大损失，中华书局营业遂更加发展。1934年在九龙新建最新设备印刷厂一座，专业承印国民党政府的钞票和债券。1937年春，资本扩充为四百万元，年出版书籍千余种，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所，沪港两厂职工共达三、四千人。在此时期，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大中华辞典》、《辞海》，重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陆费逵自依附四大家族孔系官僚资本后，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而声名愈著，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实业部新闻纸制造厂筹备委员、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1936年，在上海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37年夏，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连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发表过不少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1912年1月，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提出当务之急有四：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章程；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和规定行政权限^③，得教育总长蔡元培采纳。又与蒋维乔共拟《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同年1月19日经教育部审定公布，主要内容为初小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注重手工教育，中学师范改为四年，中学文实不分科及废止奖励出身等。此外，他还发表《民国普通学制议》、《新学制之要求》和《国民教育当采实利主义》等文，阐述他的教育救国主张。陆费逵还极力推行国语运动，辛亥革命前曾发表《论设字母学堂》一文，主张统一国语，统一读音，改革文字。辛亥革命后，他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读音统一会，会后在上海提倡国语运动^④。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

文运动。

陆费逵又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信仰佛教。1918年秋，他与人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主张“采宗教之学说为精神之训练”，以佛教为“精神教育”^⑤。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中华书局工人踊跃参加“三罢”斗争，要求承认工会和改善生活条件，他不但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肯答应，而且反对工人罢工，甚至勾结军警加以镇压。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月，他在《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备战》的文章，主张“一致对外”，“长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但同时却不赞成立即对日宣战，要求“慎重”^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职工遣散，而将部分机器运至九龙扩充印刷厂，将总局迁到昆明。陆费逵也由上海迁居九龙，主持香港分局的营业。沪地剩余部分机件由吴叔同经管，1939年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九龙寓所。遗著有《教育文存》（五卷）、《青年修养杂谈》和《妇女问题杂谈》等。

（熊尚厚）

注：

①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1934年3月2卷6期。

②陆费逵：《教育文存》第一卷22—30页，72页，105页。

③陆费逵：《敬告民国教育总长》，1911年1月《教育杂志》第三年第十期。

④陆曼炎：《时贤别纪》第二集，1943年11月，重庆文信书局版，第77—82页。

⑤陆费逵：《教育文存》第一卷22、24页，第二卷42页。

⑥1933年1月《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陈 光 甫

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

1892年，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他随父到该行学徒，工余跟随比利时人狄来学习英语。1899年转到邮局工作，1902年到汉阳兵工厂当译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和景的女儿结了婚。1904年，通过景维行的活动，陈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商学士学位。当年回国后即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到江苏省银行任督察，1914年离职，转任中国银行顾问。

1915年6月，陈光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的时机，与信义洋行经理庄得之等人集资八万余元，又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答应以中国银行存款相助，在上海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陈任总经理。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①，以经营小额储蓄存款和小额工商贷款为主，一元即给开储，银元与银两并用。还以“礼券储蓄”、“教育储蓄”、“零存整取”等办法广泛开辟存款来源。为适应当时新兴工商业发展的形势，又倡办货物抵押贷款，并在业务手续上尽量方便顾客。在银行内部，他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行训”，并向职员们灌输“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观念，以混淆劳资界限，笼络职工为他出力工作。这样，上海银行的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资本即增达三十万元。1917年增办国外汇兑。1919年资本增至一百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处。1922年资本达二百五十万元。1923年创办旅行部，后扩充为“中国旅行社”，是我国自办旅行业之始。

1925年，陈光甫受北洋军阀段祺瑞邀请，出席善后会议；同时与国民党方

面人物密切交往，经常借款给孔祥熙、宋子文在上海搞投机事业。

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之初，陈光甫慑于革命声势，曾先后将十多个行处收束。不久，江浙资产阶级决定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陈光甫是参与这一活动的头面人物之一。1927年3月底，蒋介石由南昌到达上海，与大买办虞洽卿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从上海的银行、钱庄两业中为蒋垫借三百万元的政变经费。“四·一二”后，陈又为蒋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大卖力气。从此，他得到蒋的赏识，曾畀予他财政部次长等职，他顾虑与政界靠得太紧了会影响银行的信誉，未就。1928年，国民党政府建立中央银行，他担任该行理事。

1929年2月，陈赴英国与英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并顺道在欧洲一些国家考察金融、商业。6月，受国民党政府委派，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0年他回国后，极力宣扬“劳资合作”。这年上海银行增资，他将新增资本股票的一半派给职员认购，说什么这就“使行员皆成股东”了^②。

1931年前后，水旱灾荒遍于全国，陈在上海银行设农村贷款部，与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合办农村贷款，盘剥农民。1932年他就任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帮助国民党政府发行公债，筹措反革命内战经费，还顺从蒋政府的意旨，将内债延本减息。这个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席、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上海市临时参议员等职。

随着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的逐渐形成，民族金融资本日益受到威胁。陈光甫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虽然也有所不满，但权衡利害，还是不得不向官僚资本投靠。他把上海银行的股票送给孔祥熙，让孔担任银行董事。同时，他还极力向国外活动，以“打通欧美各银行与本行发生直接往来”视为上海银行“新生命的寄托”^④。

1934年，日寇为进一步侵略华北，逼迫国民党政府恢复北宁路之平沈段通车。蒋介石为掩人耳目，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密谋，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

1936年3月，陈光甫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并被委派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到美国缔结白银协定。他以中国固定对美汇率为条件换取美

国收买中国白银。这一断送中国币制独立性的活动，博得了美帝国主义对他的赏识。

到1937年，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五百万元，较开办时增加六十多倍，公积金九百多万元，存款总额一亿八千余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十左右，职工人数由开办时的七人增加到二千七百余人。这时，上海银行已由原来的一个小银行发展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成为“南四行”之一。

“七七”事变后，陈光甫将总行管理机构迁到香港，上海改称分行，同时把江浙等地一些行处撤销，在西南内地组设新的行处，在重庆设总经理驻渝办事处。这时，国民党政府虽然采用通货膨胀的手段，并由蒋介石亲自掌管四联总处，来限制商业银行的活动，但上海银行的存放款余额仍然逐年增长。

1938年，陈光甫由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又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到美国借债，签订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在国内设复兴公司，在美国设世界贸易公司，由这两个公司负责购销桐油偿还债务。1939年10月，陈又奉命以滇锡作抵押，签订二千万美元的滇锡借款。1940年4月，又以国内钨矿作抵押，签订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钨矿借款。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频繁向美借债，引起了日寇的注目。他为保全沦陷区的产业，将“上行”总经理之职改由杨介眉代理。

1940年6月，陈光甫由美回国。是年他与章乃器在四川合组上川实业公司，以后陈退出，另组上川工业公司。

1941年8月，美、英各自从对华贷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平衡外汇的基金，建立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陈任该会主席。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进行买卖外汇投机；又通过上海银行在汉口建立的大业公司大肆购运出口物资和购囤进口商品，获得了厚利。

1944年春，陈光甫遵照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令，将上海银行总行迁至重庆。这时，他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便派员去美国订购设备，幻想在战后大办工业。同年10月，陈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各国对中国战后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投资。会后又与张嘉璈，李馥荪等亲自同美国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

抗战胜利后，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资本家合办的信托公司（又称中国投资公司）在纽约开业，该公司以作证券交易、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为主要业务。1946年，陈又在美国纽约设立上海银行通讯处，加强与美国银行界的联系。此后他将大量外汇转移到美国，上海银行则代理美国的一些银行在华收付事务。他由于在经济上与美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上也就更加投靠美国，上海银行最初标榜的所谓“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行训至此就一变而为“促进国际贸易”了。

1947年4月，张群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陈光甫当了国府委员。为协助张群、张嘉璈（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管理财政，陈出任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输出推广会副主任委员，美金公债监理会委员等职，参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经济措施的策划。这一年，陈与美资本家合办的国泰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解放战争中，陈光甫预感到形势不妙，将他的大量资金赶紧移往香港。1948年，他去曼谷筹设上海银行分行。天津解放后，他曾以“协助解放区经营进出口业务”为名，拨了十万美元给天津分行，借此试探人民政府的政策。但是，他由于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根深蒂固，终于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借口参加在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从大陆逃往香港。

1951年，陈光甫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为上海商业银行，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1954年陈去台湾省，在台北市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营业。陈亦在台北定居，1976年7月1日病死。

（江绍贞）

注：

① 陈光甫1920年12月与济南分行经理龚祥霖的谈话，《陈光甫先生言论集》34页。

② 1931年1月18日第一区武汉同人欢迎总经理开会记录，《海光》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③ 陈光甫告同人书，《陈光甫先生言论集》7页。

④ 1933年1月28日陈光甫在管理会上致辞，《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37页。

张 伯 苓

张伯苓，原名寿春，以字行，天津市人，生于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他的父亲张云藻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1892年，张伯苓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五年后毕业，入海军当士官生。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山东威海，1898年又转让给英国。张伯苓当时正在军舰上服务，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悲愤填胸，深受刺戟”，认为国家“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①。不久，他便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离职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

张伯苓回天津后，先在严修（曾任清学部侍郎）家中教家馆，讲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教体育。以后又兼在天津富商王奎章家中教家馆。1904年4月，张伯苓随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8月回国后，仿照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将严、王两处家馆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有学生七十余人，教员三、四人。年底，改校名为敬业学堂。不久，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学生逐年增加，校舍不够用，1907年在天津南开地区建筑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的教育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很严，深得社会好评，学生人数增加很快，1911年已满五百人。1915年，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这是张伯苓试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两科相继停办。

1917年秋天，张伯苓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及其发展。次年冬天回国，立即着手向中外各方面募捐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季南开校舍建成，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招生百余人。后来曾一度增设矿科。

五四运动时，南开学生曾经积极参加爱国群众运动，张伯苓却“躲在家里，不到校，不支持”^②。这年秋季开学时，在全校大会上，他又责备学生不应该到社会上去闹，说：“大家要好好念书，爱国不是这样爱法”，^③当场

遭到学生质问。但是，后来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学校负责人向他请示办法时，他又指示打开后门放走学生。对于已经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他也曾设法进行营救。

1923年，张伯苓应当时社会上的要求，开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他赴东北各省调查，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伸入东北十分忧虑，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指派人编辑东北地理作南开中学教材。1928年南开设实验小学，1931年设经济研究所，次年设化学研究所。这时，南开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余人。1936年，张伯苓又在重庆开办了一所南渝中学，1938年改名南开中学。

张伯苓对于他所标榜的“教育救国”的目的曾经概括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首曰愚，次曰弱，三曰贫，四曰散，五曰私，……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从这种错误的认识出发，他办学的方针也有五点：‘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养救国力量。’^④他办学几十年，一直坚持这个方针。

张伯苓曾于1909年加入基督教，后来在天津办过教堂，还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但他一不主张由外国人传教，二不主张在学校传教。他认为个人有信教自由，学校不能用宗教影响学生，不能办成教会学校。他在南开每星期给全体学生上一次修身课，课上常常引用《四书》上的话，却从不引用《圣经》上的话。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天津的驻军每日清晨在南开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张伯苓对此十分愤慨。他常常在修身课上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⑤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30日，南开遭到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猛炸，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同年10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一直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他说他不主张学生在校搞“党派”活动，还曾把自己比作是蒙上眼睛的驴，只管教育，不管别的。但是实际上，他一方面容许国民党三青团在南开中学活动，而另一方面对

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尽管他曾表示可以介绍他们去延安，却害怕他们在学校里搞革命活动。

1938年，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他常常向人吹捧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要大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在参政会上，他也是为国民党政府说好话，要大家“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⑥同年，蒋介石派人拉张伯苓加入了国民党，从此对他更加重视。1938年和1940年，蒋介石曾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并拜访张伯苓。1944年元旦，国民党政府颁给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褒奖他“为国造士”。10月，南开举办“四七庆祝大会”，庆祝南开建校四十年和张伯苓七十岁生日，蒋介石曾亲往其寓所祝寿，颂扬他“桃李满天下”，还书写“南极辉光”四字相赠。1945年5月，张伯苓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冬天，他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美治病，蒋介石曾赠以医药费美金一万五千元。

1946年春季张伯苓自美返国。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后，有人对张伯苓说国民党政府很不得人心，但他仍然寄希望于反动统治阶级，为其辩护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好，总得一点一点的好。”^⑦这年11月，张伯苓当选为伪国大代表，参加伪国大。1947年春天，他和胡适等一起组织了所谓“华美协进会”；秋天，又分别在天津、北平组织了所谓“民治促进会”，企图借此拉拢一批教授、名流，供美帝国主义驱使。1948年6月，张伯苓就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南京解放前，逃往重庆。四川解放前夕，蒋介石逃离重庆时，曾亲往张伯苓寓所劝其同行，他未同意，仍留重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伯苓曾致电给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到北京，不久回天津。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故。临终前留有遗嘱，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并嘱其学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⑧

（宗志文）

注：

①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南开四十周年校

庆特刊。

②王守纲：《五四前后我在南开中学时的一点回忆》，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未发表稿。

③同②。

④同①。

⑤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未发表稿。

⑥同③。

⑦同⑤。

⑧《人民日报》，1951年3月3日第三版。

胡 适

胡适原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祖父在上海经商，家中颇有田产。父亲胡传是个乡绅，1881年到吉林投吴大澂幕，后来在上海任淞沪厘卡总巡，最后做到台湾直隶州知州。

胡适于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在上海。1893年，随母到台湾与父亲同住。中日战争爆发后，1895年3月，随母回到绩溪家乡。是年8月，他父亲病死厦门，遗嘱要他“努力读书上进”，并留下手写的《学为人诗》，教他“谨乎庸言，勉乎庸行”，“黽勉于学，守道勿失”。胡适后来说，这寥寥几句话，对他“一生很有重大影响”。①

胡适回到家乡，开始入塾读书。他母亲“望子成龙”，向塾师多交数倍的学费，使他在塾中受到特别的教育和优待。

1904年春，在受了九年旧式的私塾教育之后，他到上海进了新式学堂。先在梅溪学堂读了一年，后改入澄衷学堂。这时，他开始接触到西方学术与文化，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书。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新民丛报》，也成了他最经常的读物，他对梁的“新文体”的风格十分欣赏，并从中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承认自己“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②

1906年夏天，胡适又进入一个新学校——中国公学。学生们创办了一个刊

物，叫《竞业旬报》，胡适曾一度担任该刊的编辑，写过一些白话文章。1908年9月，从中国公学分裂出一个中国新公学。胡适到新公学，为低年级教英文课。1909年11月，新公学解散，胡适经王云五介绍，到一个华童公学教国文。

1910年夏，胡适到北京考取了第二批庚款留美生，9月间，从上海去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1912年春，转入文科。1914年6月，得文学士学位毕业。以后，他继续留在该校一个时期，研究哲学。

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报纸上披露，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写信或打电报给国内，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谴责袁世凯卖国。有一次，留学生为此集会，胡适借故不去参加，写一张便条说：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函电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留学生们对胡适这种冷漠态度非常气愤，“皆争嗤之以鼻”。^③过了不久，他又用英文写了一篇《致留学界公函》，主张留学生无须过问国家安危，要“认真地、安静地、不受干扰地和毫不动摇地专心致力于学习”。^④

是年9月，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跟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哲学。从此，他成了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思想，都受着这一反动哲学的支配。1917年5月，他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博士论文，结束学业，但直到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才授予他博士学位。

胡适虽然反对留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他对美国大学生及美国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却很热衷。1912年他参加所谓“世界大同会”，1913年又被推选加入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中优秀学生的一种联合组织）为会员，并参加了国际政策会、联校非兵会等社团活动。1914年，他曾代表康奈尔大学到哥伦布城参加世界大同会年会，充当议案股主任，大出风头。他还曾特地拜访卸任的美国总统塔虎脱，同他讨论所谓远东问题。胡适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风尚无比钦羨，常常发出中国“百不如人”的感慨。这是他一生根深蒂固的崇美亲美思想的重要基础。

1917年7月，胡适回国，当即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早在留学时期，胡适曾通过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的介绍，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建立

了联系。他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就是在陈独秀的劝促下而写的。1918年4月，他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标榜“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专意鼓吹文学形式的改良，大力提倡白话文。是年，胡适正式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同路人。

1919年3月，胡适与蔡元培、陶行知等商定，以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邀请正在日本游历的杜威来中国讲学。紧接着，胡适便在北京连续作“实验主义”的讲演，介绍杜威哲学。

在胡适到上海迎接杜威期间，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杜威6月初到北京。他很快就看出了“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一到北京，便改变原拟当年夏天回国的计划，决定在中国作长期讲学。并且在胡适建议下，他着重地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把宣传改良，反对革命，视为最紧迫的课题。与此同时，胡适也决然改变了他刚回国时所作“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表示，直接参与破坏学生罢课斗争的勾当，并从此大谈政治。

1919年6月，胡适接办原由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7月，他在该刊连续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三篇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而不要“高谈主义”。^⑤ 他诋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⑥ 他的反动谬论遭到李大钊等人的驳斥。是年11月，胡适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进一步鼓吹“一点一滴的进化”，同时提出了所谓“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右翼资产阶级的口号，妄图把新文化运动拉向右转。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杂志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更多了，且于1920年9月将编辑部迁到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胡适对此极为不满。他于1920年12月到次年2月，连续写信给陈独秀、李大钊等，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了，^⑦ 要求根本改变《新青年》的方向。他提出：或者将编辑部移回北京，宣言不谈政治；或者由在北京的胡适等人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或者停刊。当时，鲁迅看穿了胡适的反动企图，认识到《新青年》编辑部必然分裂的趋势，主张听其分裂。从此以后，

胡适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滚到反动营垒中去了。

此后，胡适加紧从事反动的政治活动。1921年5月，他邀同丁文江、王征等一起，决定成立“性质为秘密的”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的会章，明确规定了改良主义的政治目标和严格的组织细则。这个组织虽然没有象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团，但以这个组织为起点，胡适逐渐拉拢了一批亲英美的知识分子，在长时期中，以多种形式互相结合，构成反动营垒的重要的一翼。

1922年5月，胡适与丁文江等创刊《努力周报》。胡适声明：他办这个刊物，“大部分是由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和‘赢余价值’”而“激出来的”。又说：“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⑧在该报第二号上，胡适发表了由他起草，拉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建立“好人政府”。他一面宣扬改良主义，一面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旗手孙中山。当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时，胡适竟为他欢呼，称他是“革命”行动，反诬孙中山“倒行逆施”。⑨是年10月1日，胡适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这是他第一篇直接反共的文章。文中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美化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半殖民地秩序，其反共卖国的政治面目开始暴露。

这时期，胡适经常参加由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总长以及研究系政客们组织的茶话会，同他们频相往还。他曾主动献殷勤，为黎元洪起草一份施政计划；他还设法靠近军阀吴佩孚，多次与吴的心腹白坚武、孙丹林等通信和密谈。他曾一度狂热鼓吹所谓“联省自治”，以迎合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维护各军阀集团的既得利益。

在思想文化领域，胡适背叛新文化运动，加紧宣传反动的实用主义，鼓吹研究国故。杜威在中国讲学两年，他曾多次陪同到各地活动。杜威回国后，他特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力图加深杜威的反动影响。胡适把实用主义应用于考证学，提倡所谓“整理国故”。他在《论国故学》一文中宣称：“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从1919年到1922年，

陆续发表了《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以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一系列文章，兜售他的实用主义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资产阶级治学方法。1923年1月，胡适主编的《国学季刊》出版。他在《发刊宣言》中鼓吹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随后，他开出了一个长长的国学书目。那时，从研究系政客梁启超，到《学衡》派的梅光迪，纷纷写文章、办杂志，以谈国故为时髦，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使不少青年堕入迷雾。鲁迅看穿了他们的鬼蜮伎俩和反动实质，揭露胡适这类“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们，是以“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现实革命斗争。鲁迅告诫青年们，不要上当，鼓励他们“蔑视古训”，坚定地走革命道路。^⑩

1923年，在胡适支持下，丁文江与张君勱展开了一场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双方都有一些助战者。丁自诩代表“科学”，骂张是“玄学鬼”。丁文中的主要论点，事前都曾写信与胡适商量过。当时胡正在杭州休养，他写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勱》，对张加以嘲讽。实际上，胡适、丁文江不过是以马赫主义反对张君勱的直觉主义，双方贩卖的都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思想。是年12月，丁、张双方论战的文章集为一册出版，书名《科学与人生观》。胡适特写了长篇序言，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这就更暴露了这次论战的性质。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南方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因贿选总统而声名狼籍的曹锟，改组了内阁，并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废除其帝号。这一进步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胡适却极为不满。他在溥仪出宫的当天（11月5日）晚上，写信给刚上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大骂冯玉祥是“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在《晨报》发表后，舆论大哗，青年学生乃至一些大学教授一致申斥胡适替封建余孽辩护。连他的好友唐钺也不赞成他如此“卫护溥仪”。

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于1925年2月召集所谓“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动实质，国民党也拒绝参加，全国进步人士均取抵制态度。胡适竟以所谓“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的身份参加“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捧场。

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全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正在斗

争高潮中，胡适发表谈话，要求人们停止斗争，等待“政府交涉”。又发表文章（《爱国运动与求学》）指责学生不应参加爱国运动，竟要学生学习歌德的榜样，“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

8月间，在查点清室文物过程中，发现康有为、金梁等清室遗老图谋复辟的材料。其中在金梁的一份“奏折”中提到，胡适两次进宫（1922年5月和1924年5月），已“为皇上所化”。材料一公布，舆论为之哗然。当时北京有人以“反清大同盟”的名义发难，要驱逐胡适出北京。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写信谴责胡适“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等“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

早在1924年12月，胡适派文人陈源（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胡适是主要的赞助者和经常的撰稿人。他们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断向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发动进攻。陈源等人曾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攻击鲁迅。1926年5月，胡适突然装出公允的面孔，分别写信给鲁迅和陈源等，说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层层猜疑，层层误解”，“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企图抹杀斗争的阶级实质，妄想阻止鲁迅对他们实行反击。

1926年2月到6月，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之一，陪同来华的英国委员威灵顿等先后到几个大城市“考察”教育。随后，他辞去北京大学教授的职务，取道莫斯科去英国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1927年1月，胡适离英去美国，在美停留三个月，然后启程回国。那时，正值第一次大革命因蒋介石叛变而走向失败。胡适路经日本时，从他的几个朋友的信中得知国内这种急剧的政治事变。他看到多年依附的北洋军阀，行将被蒋介石集团所取代。于是，他赶在踏进国门之前，即在日本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说，“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⑪

胡适5月回抵上海，6月被选充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的董事，并兼任秘书，掌握了该会的实权。以后，他又在中基会下组织了一个编译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主持编译欧美文化书

籍。胡适在中英、中美两个最重要的庚款管理机构中任职，这就为他经营买办文化提供了重要条件。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为取得庚款补助，纷纷争聘他为董事（或理事）。利用这种地位，他在文化教育界积极培植亲信，扩大影响，造成买办文化的基本势力。他本人则成为买办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

1927年8月，胡适就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0月，应蔡元培之邀，充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并参与筹备中央研究院的活动。次年，他辞去上述职务，就任中国公学校长。

1928年3月，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宣扬以人性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鲁迅代表的革命文艺思想相对抗。

1929年，从《新月》第二卷第四期起，胡适陆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几篇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曾令教育部对胡加以“警告”。胡适虽拒绝了“警告”，但在稍后出版的《人权论集》的《小序》里，他表明心迹说：“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实在不忍袖手旁观。”即希望蒋介石搞点改良政治，以便消弭人民革命的怒火。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上又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他完全抹杀阶级斗争，杜撰了所谓“封建主义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的五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他宣称“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显然，这种谬论完全是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的。这一年，他出版了《胡适文选》，并撰写了长篇序言《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

1930年5月，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11月，到北京，重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开始担任文学院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北京发起所谓“自觉救国会”，宣言反对对日作战和对日绝交，鼓吹所谓“曲突徙薪之谋”和甘地式不合作主义。同时，他还与蒋廷黻、丁文江等人专意研究对日让步问题，向蒋介石集团献策。是年10月，蒋介石曾特召见胡适与丁文江，“垂询大局”。11月，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承认日本在国联提出的侵略中国的“五项原则”，与之谈判妥协。

1932年5月，胡适同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办起《独立评论》。他们

的编辑方针是：在内政方面，配合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宣扬“统一”高于一切，并强调“中心人物”及“武力”是“不可免”的，主张“专制是事实所必需”。在外交方面，鼓吹“以亲日为用，自强为体”，反对所谓“仇日派”，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的人民。在思想方面，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是一种拥蒋、反共、卖国三位一体的极端反动的编辑方针。胡适在创刊号上的《宣言》里，标榜什么“不倚傍任何党派”的“独立精神”，完全是骗人的。

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得到胡适等一批有影响的亲英美的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自然很高兴。因此，曾先后给予胡适以各种名誉头衔，如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东北政治委员会委员等等。胡适则对蒋介石尽力帮忙，以图报效。为开脱蒋介石丢弃大片国土的罪责，胡适两次写信敦促张学良引咎辞职，充当替罪羊，借以平息人民的反蒋怒潮。1932年12月，宋庆龄等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同盟，胡适加入了同盟，并取得了北平分会会长的头衔。但不久，他就开始从内部进行分裂和破坏。1933年2月，他在英文《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反对同盟关于释放政治犯的主张，并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随后他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人权的保障》一文，继续反对同盟的进步宗旨。最后，他被开除出盟。

胡适的拥蒋反共的政治态度，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特别欣赏。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曾频频和胡适书信往还，同他商谈对日妥协的种种问题，还竭力拉他加入政府。但胡适认为，作为政府的一个“诤友”，比加入政府更容易发挥他的作用，所以婉辞了。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的时候，北方抗日空气高涨。3月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要他亲自来“挽救”局势。蒋介石特从江西“剿共”前线跑到保定，部署停战妥协。胡、丁、翁于3月13日受到蒋的接见。4月19日，胡适、丁文江、蒋梦麟又与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及于学忠讨论停止长城抗战事。不久，在英帝国主义分子的中介之下，中日双方密谈，炮制了可耻的塘沽协定。

胡适一面直接参与统治集团的某些投降活动，一面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大量文章，宣扬卖国主义。他甚至公然说：“我宁愿亡国”，“决不愿主张作战”。^⑫他认为，中国“学识能力远不如他国进步之速”，^⑬受人侵略是活该如此。他希望日本人能以占领东三省为满足，停止武装进攻，改换策略，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⑭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不理睬胡适的“劝告”，它“毫不掩饰的推翻一切‘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传统政策”，^⑮这就触犯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利益。在此形势下，一向极端亲美的胡适，感到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933年11月，胡适发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面继续鼓吹“不必与日本冲突或决裂”；一面却特别强调，中国应当进一步靠拢由美国控制的国联。他说，中国的将来“必须依靠一个比较近于人类理性的国际组织”。实际上，他是希望蒋介石政权从此完全走上亲美的路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对蒋介石集团推行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卖国政策十分痛恨。胡适却竭力为蒋介石辩护，他说，大片国土之所以沦丧，是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⑯他甚至还写信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建议向日本“谋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息”，来解决国内的“武装割据”问题。^⑰

胡适一面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一面积极参加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从1931年到1935年，胡适陆续发表了《〈王小航先生文集〉序》、《惨痛的回忆与反省》、《建设问题引论》、《信心与反省》（三篇），以及《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等文章，极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鼓吹买办文化，咒骂人民革命，兜售西方改良主义。1935年7月，胡适发表《〈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则是专意攻击鲁迅的。1936年11月，反动作家苏雪林写信给胡适，用极其卑鄙恶毒的语言攻击刚刚逝世的鲁迅先生，要胡适领导反动作家，把被左派占领的阵地再夺回来。胡适回信很鼓励苏的反动立场，并向苏传授所谓“釜底抽薪”和“攻心为上”的反革命策略。

胡适一贯反对学生运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全国进步学生不断掀起

爱国运动，反对蒋介石卖国残民的法西斯独裁政策。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蒋梦麟对他言听计从；而北大是所谓“北平八校之首”，各校行政当局皆惟北大之马首是瞻；所以胡适便成了北平教育界反对学生运动的支柱。他一再发表文章和讲话，鼓吹所谓“读书救国”。他动辄抬出法国巴斯德的例子，要青年们学习巴斯德“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和试验室”。^⑮他谩骂进步学生“无心求学，有意捣乱”。^⑯当震动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公然为蒋介石及宋哲元的卖国行径辩护，甚至宣称，镇压学生的军警暴行“是可以原谅的”^⑰，责难学生事前不把游行路线告诉军警当局。他还恶意攻击“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更肆意咒骂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是纯洁的青年运动的罪人”。^⑱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时，胡适刚刚参加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年会，从美国回来。当他得知情况后，立即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攻击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同时却称赞亲日派何应钦等挑动内战的“讨伐令”是“正当的”。文章还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是“欺骗”，是“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这篇文章非常适合南京反动当局的胃口，将它大量翻印，派飞机到西安散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逐渐走向一致抗日的局面。蒋介石集团出于调整它的内外政策的需要，于1937年夏在庐山召集各界名流举行“谈话会”，胡适是被邀参加者之一。他到了庐山，表现非常活跃，与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当权要人频频接谈。这时，他仍反对对日作战。他对蒋介石说：“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他主张保存力量去对付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胡适成为国防参政会的参议员。从此，他改而宣扬“和比战难”的论调。蒋介石急于取得英美的援助，遂决定委派胡适到欧美活动。

胡适9月到美，10月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然后开始在美国各地旅行演说。1938年7月，他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他刚踏上欧洲大陆，便连续接到蒋介石及

其行政院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的三通电报。这是蒋介石集团加紧实行亲美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胡适经过短暂的考虑，便欣然受任。

1938年10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就任大使，当即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付精神应付”。稍后，他在赠给陈光甫（受派赴美谈判借款）的小照上题字道：“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表露出竭诚为蒋介石集团效力的心情。

是年12月初，胡适在纽约发表《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演讲，提出所谓“苦撑待变”的“理论”，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前途，完全依赖于国际条件的变化，尤其是依赖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是月，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出走香港，准备向日寇投降。胡适于得到国内的报告后，致电汪精卫说：“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想拉住汪精卫，和蒋介石一道走上亲美的路线。但就在胡适发电的那一天（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迈出了公开投降日寇的决定性的一步。胡适为此很替汪惋惜。

胡适在美期间，积极配合陈光甫，向美乞求借款。此外，他最卖力的就是从事反共宣传。他利用一切机会在美国当局和在野人士面前竭力为蒋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辩解。皖南事变发生后，胡适立即发表谈话，诡称“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②②}他还致电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其反共政策，声称：“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在另一电中，他指责陕甘宁边区“有何法律依据？”后来抗战刚刚胜利，胡适两次直接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放弃武器”的狂妄要求，表现了一贯的坚决反共的立场。

1942年8月，国民党政府免去胡适驻美大使的职务，聘他为行政院高等顾问，但他没有回国就职，继续留在美国，直到1946年。其间，他从事讲学和写作，特别致力于《水经注》的有关考证。他曾一度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在他归国前，暂由傅斯年代理。是年11月，胡适代表蒋介石政府，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会议。

1946年7月，胡适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1月，他到南京参加伪国大，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伪宪法的起草。最后，他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将这个宪法献交蒋介石。

是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兵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学生们纷纷罢课，游行示威，抗议美兵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胡适得讯后，匆忙从南京飞回北平，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极力压制学生运动。他发表谈话称：“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又说：“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②③}胡适极力把事件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掩饰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其奴颜媚骨暴露得异常充分。由于国民党政府及胡适之流坚持媚美方针，美军罪犯竟被护送回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1947年1月，蒋介石由于发动反共内战受挫，为欺骗舆论和乞求美援，玩弄“改组政府”的把戏，想拉胡适加入政府。蒋通过傅斯年向胡致意。但他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盘算，婉谢了。他写信给傅斯年说：若是加入了政府，“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的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3月间，胡适到南京，两次见蒋，当面力陈“不能参加政府之苦衷”。而蒋介石终以未能罗致胡适而“殊为耿耿”。胡虽然没有参加国民党政府，但与反动统治集团却保持着特殊的紧密联系，经常密电往来，互通情报，而且蒋介石还多次特邀胡适面谈。

为帮蒋介石的忙，胡适于1947年5月邀集北大、清华等校一些教授，组织所谓“独立时论社”。他们针对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问题，轮流撰写评论，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先后参加该社的有四十余人，建立关系的报纸有三十八家。胡适先后发表了《青年人的苦闷》、《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等文章，拼命攻击共产党，反对人民革命，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诱青年“埋头学术”，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他还多次发表演讲和广播，宣扬这些反动谬论，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相配合。

是年7月下旬，美国政府派遣特使魏德麦来华考察与援蒋有关问题。南京

国民党政府特电胡适，要他于魏德迈抵平时“与之详谈”，想借助胡适的关系，向美国乞取更多的美援。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内战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人民反抗运动不断高涨。各大城市纷纷掀起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北平的青年学生斗争尤为突出，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胡适则直接配合反动当局破坏学生运动。1948年2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密电胡适，称：根据特务情报，北大有学生秘密往来解放区，要胡适严肃处分。是月，北大即有学生被捕。该校的进步学生起而要求胡适向当局交涉，释放非法逮捕的学生。胡适竟指斥学生不应用“非法逮捕”一词，然后声称：他只能声请当局将被捕学生“移交法院办理”，而不能要求释放。接着他竟威吓说：“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随后他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并转蒋介石，主张对学生“按法律手续”实施镇压，不要军警直接入校抓人；认为“若用军警入校，……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以致引起中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使“政府威信扫地”。

1947年12月，蒋介石集团准备召集“行宪国大”，炮制“行宪政府”，妄图以此来挽救它濒临破灭的危机。蒋介石想再度利用胡适这块讨美国人喜欢的招牌，委托王世杰等人出面劝胡适参加总统竞选。胡适经过再三犹豫，正准备答应时，国民党内一部分实力人物起而反对，此事遂作罢论。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当选院士。他参加了全部筹备活动。实际上，数十名文科院士都是由他圈定的。

内战的形势急剧地发展。由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所进行的这场反革命内战，直接关系到胡适的切身利益。他感到无法忍受内战失败的后果。他象一切逆着历史车轮行进的反动人物一样，直到失败即将成为事实之前的一瞬间，仍然渴望着、幻想着胜利。1948年9月，胡适走出北大，到全国许多地方旅行演说，大讲反共内战的意义，诱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幻想巩固反动营垒，振作“士气”，同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作拼死的斗争。他曾作了一首小诗说，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不是简单的普通内战，不是政权的争夺，

更不应该是为保护豪门，保护特权，而是民主、自由、平等与极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他竟把一场卖国残民的反革命内战美化成“圣战”。但胡适的梦呓般的谬论，已经骗不了多少人了。

1948年11月，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在全线崩溃的前夕，又一次敦请胡适，要他出任行政院长，来支撑残局。他当然不会干。当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经“朝不保夕”。胡适奉命前来劝他“出山”的陶希圣，向蒋介石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②4}12月15日，蒋介石特派专机，将胡适从被解放军紧紧包围的北平城中接到南京。

胡到南京后，受蒋介石的委托，决定赴美游说，乞求新的美援。1949年3月下旬，他到台湾安置家属，4月初从上海乘轮赴美。他抵美时，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巢穴南京已被解放。6月，李宗仁在广州改组伪政府，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他力辞。从此，长期在美留居。

胡适在赴美海行途中，写了两篇反动文章。一篇是为叛徒陈独秀的遗作所写的《序言》，一篇是为拟议出版的反动杂志《自由中国》写的《宗旨》。两篇文章都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美化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民主”；反复声言：要使中国成为“自由的中国”。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失败者的挽歌而已。

1949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出版，胡适任发行人。该刊一直出到1960年，因雷震案^{②5}而停刊。1953年，胡适辞去发行人名义，但仍为编辑委员会委员，并且始终是该刊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他先后在该刊发表十多篇文章，进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胡适在美国一直住到1958年，其间回台湾两次。一次在1952年11月，他为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作短期讲学，次年1月复去美国。另一次回台是1954年2月，为参加伪国大二次会议，会后便离台去美。是年7月，蒋介石聘他充当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胡适在美留居期间，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文教机构短期任职。此外经常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发表反共演讲，吁求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不

要承认新中国。1957年，他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恶毒攻击和诬蔑新中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占有自己的合法席位。

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次年2月，又兼任伪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7月，他到夏威夷大学讲学，接受该校赠予的人文学博士学位。胡适一生号称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学衔，这是最后的一个。10月初，由美回台湾。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死台北。

胡适一生言论著作很多。在他逃离大陆前已经出版的主要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文存》（一、二、三集）、《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以及《胡适论学近著》等。

（耿云志）

注：

①胡适：《四十自述》，1933年亚东图书馆第一版，第34页。

②同上，第101页。

③胡适：《胡适留学日记》，1947年11月商务印书馆第一版，第三册第570页。

④原文系英文，见同上书，第593页。

⑤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存》第一集第二册第151页。

⑥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同上，第196页。

⑦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0页。

⑧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

⑨见《努力周报》第8号，第12号。

⑩见鲁迅《华盖集》之《导师》、《通讯》、《青年必读书》等篇。

⑪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

⑫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

⑬胡适：《平绥路旅行小记》，《独立评论》第162号。

⑭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第42号。

⑮胡适：《“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独立评论》第98号。

⑯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大公报》1935年11月16日。

⑰李青来：《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

⑱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独立评论》第7号。

⑲胡适：《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独立评论》第8号。

⑳胡适：《再论学生运动》，《独立评论》第183号。

㉑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号。

㉒见《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2月8日。

㉓见《申报》1946年12月31日。

㉔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

㉕雷震（1897—）字傲寰，浙江长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习法政。归国后即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逃台后，一度任总统府顾问。是《自由中国》杂志的主编。1960年因写《我的母亲》一文触忌，该杂志被迫停刊，雷本人被捕入狱，服刑十年始获释。当雷被捕时，胡适在美国曾大力奔走，为雷争取声援。

（篇中凡未加说明或注明的引文，均属尚未正式发表的材料。）

张 君 勔

张君勔，名嘉森，号立斋，江苏省宝山县人，1887年1月18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父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弟嘉璈曾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

张君勔六岁入塾，十岁入上海广方言馆。1902年参加宝山县试中秀才，1903年入南京高等学校学习，不一年，因签名参加抗俄义勇军，被校方斥退。自后，在湖南长沙明德学校、常德师范学堂等处任教。1906年得宝山县公费派送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日结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次年9月加入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政闻社”。1909年6月，与吴贯因等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8月，创刊《宪政新志》，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夏天毕业回国，参加清政府鉴定留学生的考试，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勔看到袁世凯即将得势，极力怂恿梁启超与袁世凯相勾结，他自己则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4月在上海与汤化龙、林长民等发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8月，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等五团体合并组成“民主党”。10月，张作为民主党

代表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

1913年1月，张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学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张以参加“反袁”的名义回国。但回国后并未去西南，而在浙江当了交涉署长，同时主持研究系在上海所办的《时事新报》。11月，辞交涉署长职，任《时事新报》总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投靠段祺瑞，奔走南北，为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作游说，又任段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次年7月，张勋复辟，张君勱又跑到南京投靠冯国璋，为冯代理大总统事到处游说。复辟平定后，冯国璋当了总统，张任总统府秘书。之后，由于研究系与段祺瑞的关系恶化，张去职，转就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月，与蒋方震等人发起组织“松社”，标榜“以读书养性为旨”。12月，随同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在德国访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Rodulf)(Eucken)，对哲学发生兴趣。梁、丁等回国后，张遂留居德国从倭铿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求教。自此，对康德唯心论哲学极为崇拜，奠定了他自己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1922年1月，张君勱回国，曾一度任上海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参加过章炳麟在上海召开的国事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参加草拟宪法，之后，著《国宪议》，幻想在军阀统治的局面下施行宪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深入的传播，引起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极端恐惧。张君勱伙同梁启超公开反对科学，反对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2月，张跑到清华学校作所谓“人生观”问题的讲演，大肆贩卖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宣扬“生命力的突进”，宣扬“自由意志”，提倡孔孟之道和内心修养，叫嚷要复活宋明理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①，在反动唯心主义哲学阵营内部引起一场大混战，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张被称为“玄学鬼”。

1924年，张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

1926年10月，北伐军到达武汉，张悄悄溜到武汉观察动向，写了《武汉见闻录》，也条举一些革命新气象，为自己摇身应变作准备。次年，蒋介石发动

反革命政变后，他又大唱反苏反共滥调，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作某些指摘，为此，张曾一度遭蒋帮拘禁。被释放后于1929年再次到德国，在耶那大学任教，1931年9月回国。

张君勱回国后，任教燕京大学。同时与张东荪等人拉拢一些研究系残余分子和一些封建余孽，秘密筹建“国家社会党”。1932年5月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提倡所谓“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订的民主政治”，主张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4月，召开“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张当选为该党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

国社党成立后，张曾往山西寻求军阀阎锡山的支持。是年11月闽变发生后，又南下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刚到福州，见蒋介石正调集大军包围福建，预感到福建人民政府将归于失败，旋即转往广州投奔邹鲁，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其政治上的反动，受到进步师生的反对，半年后去职。1935年，受陈济棠聘，再到广州，帮助陈济棠办学海书院。

在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猖狂围剿期间，张曾于1931年写过《史大林治下之苏俄》一书，作反共宣传。1936年11月，又跑到瑞金作反共演说，诽谤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国近百年来内乱的第一件大事”。②

“七七”事变后，张君勱先后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次年4月，张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③“国社党”于是公开活动。7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西迁后，他率领一部分国社党员前往重庆，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自立军制”，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④。对于张君勱这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谬论，中国共产党对之作必要的批驳后，仍然对他进行教育，争取他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1939年9月，张任国民参政会所设之宪政期成会委员，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作过一些努力。11月，张代表国社党加入黄炎培等发起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10月，张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到资助，与陈布雷等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于云南大理，张任院长。

皖南事变后，黄炎培与张君勱等人集议，认为调解国共两党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便于1941年3月，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布政纲，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主政治。纲领中同时也掺入了反对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主张。1944年9月，为容纳无党派人士，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均任常委。

1944年底，张赴美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次年4月，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担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在美期间曾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⑤头子伍宪子等人策划两党合并。又往英国伦敦考察英国工党。

1946年1月，张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回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起草宪法草案。是年8月15日，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正式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妄想建立超阶级超党派的政府，以所谓“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⑥。

政协会后，张君勱曾随同黄炎培等人，以第三者身份参与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10月，蒋介石在加紧对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下令召开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及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均坚决抵制，张君勱在民盟也曾多次表示要信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但不久即受蒋介石的拉拢，不顾民盟的劝阻，决心卖身投靠，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⑦。2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民社党出席伪国大代表名单。这种可耻行径当即遭到广大社会人士的谴责，民盟令其退盟，民社党亦由此分裂，张东荪退党，伍宪子等人与张君勱分为两派。张君勱“中立”的伪装被彻底戳穿。

1947年4月，张君勱伙同青年党头子曾琦与蒋介石签订所谓三党施政方针十二条，并向蒋介石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至此，民社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7月，民社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任该党主席。嗣后，他东窜西跑，到处宣讲伪宪法，并于年底跑到美国作鼓吹。次年3月，访晤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蒋介石乞求美援。1949年4月，蒋介石

想利用张君勱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已逃居澳门，未敢就任。11月，以“讲学”为名，由澳门逃往印度。

张到印度后，曾在德里大学及加尔各答大学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游说。1951年到美国。195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所谓“中共政治”的研究。次年，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著书立说，极力宣扬孔孟哲学和宋明理学，攻击中国共产党“叛离”了中国传统，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1958年后，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南越、新加坡等国和地区游说，配合帝、修、反反华大合唱。1969年2月23日死于美国旧金山。

（江绍贞）

注：

① 张君勱：《人生观论战》，国泰图书局，1928年10月版。

② 张君勱：《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线》，《再生》四卷四期，1937年5月。

③ 1938年4月13日张君勱致蒋介石、汪精卫信，《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版。

④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十期，1938年12月。

⑤ 民主宪政党是美洲华侨中的一个政治组织。系由康有为在美洲所建保皇党演变而来，其领导人伍宪子、李大明等人。

⑥ 《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再生社，1946年12月版。

⑦ 1946年11月20日张君勱致蒋介石的信，《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再生社1946年12月版。

曾 朴

曾朴字孟朴，又字籀斋，笔名东亚病夫，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1872年3月1日（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生于江苏常熟一个官僚地主大家庭。1891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未中，他的父亲替他出

钱捐了个内阁中书。1895年冬进入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法文。次年以所著《补〈汉书艺文志〉》及《补〈汉书艺文志〉考证》献给翁同和，很受赏识。^①同年，应考总理衙门，没有录取，“决心舍弃仕途，别寻发展的途径”。^②

1898年，曾朴在上海经江标介绍，结识福建造船厂厂长陈季同。陈在法国侨居多年，熟悉法国文学。他常去陈处请教，此后三、四年内，读了不少法国文学和哲学书籍，“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③

1900年1月，慈禧太后立载漪之子溥隲为皇子，准备废弃光绪皇帝，曾朴曾与人联名电谏。^④1903年因受人怂恿，和一杨姓丝商共同经营蚕丝，不久即因外丝倾销而破产。次年，与邑人徐念慈等在上海共同开办小说林书店，出版创作小说及东西洋小说译本。夏秋之间，从友人金天翮手里接过未完成的小说《孽海花》六回，加以点窜修改并续作。三个月功夫，完成二十回，于1905年初分为初集、二集出版。

金天翮写作《孽海花》的时候，拒俄运动正在高涨，他以清廷曾经出使俄国的洪钧为主角，洪菱赛金花为配角，计划写入“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广西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当时称为“政治小说”。^⑤曾朴接手以后，声称要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并改称“历史小说”。^⑥曾朴写出的小说，删去了金作中拒俄和反清的内容，以主要篇幅揭露清朝达官名士们的腐朽生活。书中写到了孙中山、陈千秋等革命党人，但理想和热情则倾注在光绪皇帝和改良派身上；书中对列强侵略中国也表示了不满，但在具体描写时又美化了帝国主义分子。在艺术上，曾朴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都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自称是蟠曲回旋，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的“一朵珠花”。^⑦关于这一点，鲁迅曾评之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⑧

1907年，曾朴出版《小说林》月刊，陆续发表《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五回。1908年因资金困难，书店停歇。同年，曾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第二年，应两江总督端方聘，任财政文案。^⑨一年后，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绿营营产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参加张謇的共和党，当选为江苏省议员。1914

年以后，长期任江苏官产处处长，曾以财力支持过陈其美、钮永建的反袁活动。1924年底任江苏财政厅长，四个月后离去。1926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占据江苏，曾朴任政务厅长，不足一年称病辞职。

1927年，曾朴和长子曾虚白一起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拉拢胡适、徐志摩、邵洵美等一批资产阶级文人，想造成一种“法国风沙龙的空气”。^⑩11月，刊行《真美善》杂志，标榜艺术至上和趣味主义，宣称要使它“做成一切人共同的享受”；^⑪经过修改的《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至二十五回和续作第二十六至三十五回即发表在该杂志上。按原先设想，曾朴是准备写到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后来又曾企图写到1900年或1901年，以傅彩云和瓦德西的所谓“浪漫史”作全书的总结，但实际上写到甲午战争后便停止了。

1928年，曾朴对《孽海花》作了修改。由于思想上的进一步退化，此次修改偏重于艺术技巧的提高，对原作中批判科举制度等某些有意义部分又作了删削。1931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称为三十回本。同年7月，《真美善》杂志停刊，曾朴迁回常熟，在其父亲经营的私人园林虚霏村居里莳花种竹。1935年6月23日病故。

曾朴的著作除《孽海花》外，还有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分六部，计划仿效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加儿家传》，集许多各自独立的小说而成一有系统的集合体，表现从清末同治、光绪年代到北伐战争时期的“社会变迁横断面”，^⑫但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部：《恋》。此外，还翻译过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多种。

（杨天石）

注：

①《翁同和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②《曾孟朴年谱》，《孽海花资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4月版，第161页。

③《复胡适之》，《真美善半月刊》第1卷第12期。

④张鸿：《籀斋先生哀辞》，《曾公孟朴纪念文集》，常熟曾氏自刊本，第1—2页。

⑤⑥《孽海花资料》第134页。

⑦同上，第130页。

⑧《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45页。

⑨《海虞曾氏家谱》，常熟曾氏义庄刊本。

⑩同⑤第179页。

⑪《编者小言》，《真美善》杂志2卷6期。

⑫曾虚白：《赛金花与小凤仙》，《东方杂志》复刊8卷1号。

内卫参考·注忌保存
定

内卫参考·注忌保存
定 价: 0.74元